

生平与创作

不幸的童年

一八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新历二十八日），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游的下新城（现名高尔基城）一个木工家庭中诞生。他的父亲虽然赢得了他的母亲的爱情，却为此而大大得罪了自己的岳父。原因是他出身卑微，与开染坊的妻子家不门当户对。父亲的“罪过”使儿子别什柯夫也承受了不幸。当高尔基四岁那年他父亲病逝后，他被改嫁的母亲遗弃在外祖父家中。他的童年从此便更加不幸了。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正方兴未艾。大工业对家庭手工业的无情压迫和排挤，加速了高尔基外祖父的家业的破产。小生产私有者之间的人性的泯灭，使年龄最小的别什柯夫成了这个家庭中最无力保护自己的受难者。外祖父、两个舅舅，都可以把他当作尽情发泄自己的失意与苦闷的对象。只有外祖母阿·伊·卡西琳娜对高尔基说来，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线光明。

对俄国文学来说，祖母或外祖母，无疑是人民哺育伟大作家的重要象征之一。克雷洛夫、普希金乃至果戈理，从孩提时起受到的文学启蒙，都莫过于从自己的祖母或外祖母那里听到的民间口头创作——神话故事、传说、诗与歌谣。高尔基在《童年》中对其外祖母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俄罗斯妇女聪敏、慈祥、热情、正直的美好形象。她在那个末日已站在屋檐顶上的家庭中，不仅是小别什柯夫的保护神，更主要的，还是高尔基文学天赋的启蒙人。高尔基后来回忆说：“我满肚子都是外祖母的诗歌，就像蜂房装满了蜂蜜一样；甚至在我思考问题时，也像是在用她的诗去思维”。事实正是这样，当一八七八年，下新城当时的主教来讲课时，高尔基仅凭记忆，便以诗歌的形式给他讲出许多民间故事。这使他周围的成年人都大为吃惊。外祖母还以自己作人的道德力量、对人生的真挚的热爱，为高尔基扎下了不惧邪恶、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根”。这一切，都使她的外孙终生难忘。以至当高尔基写完《童年》之后，曾一度想将小说命名为《外祖母》。

在这个环境里，高尔基从小就受到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困难的训练。他仅念过三年小学，而为了交学费，他不惜承受同学的歧视，沿街拣破烂儿换钱。当他因学业出众受到学校奖励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将得来的崭新的一本书送进当铺，换回五十五戈比交给外祖母维持生活。也正因如此，当一八七八年秋，生活仿佛执意要让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泰斗走“非学者化”的道路而迫使高尔基因穷困辍学时，他毫无畏惧地挺起胸膛，走向了人间。

苦难的“人间”

当谈到自己在人间受过的苦难时，高尔基曾说过：我“不夸大生活中的苦难，尽管它在请我吃苦时毫不吝啬”。但我们即使从他的自传三部曲中大大压缩了的介绍里，也能感觉到这是非我们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人生考验。在他年满十六岁之前，他从城市贫民子弟小学的三年级辍学后开始，已先后从事过七种职业。起初，他是作鞋店里的“学徒”，但他由于端菜汤烫伤了手离开了鞋店。又到一个绘图师家里当“学徒”，可还是摆脱不了苛重的杂役与老板娘的打骂。他终于忍受不了而擅自跑到伏尔加河畔，在一艘来往于下新城与别尔姆之间拖运囚徒的轮船上，作了大半年的“洗碗小伙计”。尔后，他又被迫回到那个绘图师家里当了三年佣人。在这之后，他还作过圣像铺的店员，建筑工地的领工，乃至商场戏院跑龙套的演员。如此频繁地更换工作的原因，不是由于高尔基本人受到有产阶级的虐待与压迫，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蒙受凌辱与歧视。但使少年高尔基感到异常痛苦的，还不是在拼命工作借以糊口时所受到的肉体磨难，而是心灵的精神重创，这使高尔基毕生未能消除对它的余悸。从这时便萌发了终生与之斗争的热情，直到十月革命来临之际这种余悸仍未消除，以致使高尔基犯了夸大俄国社会的惰性，要求推迟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感受：“在我周围，一锅不干净的粥沸腾着，我觉得，我要慢慢地给煮烂了”。正是在他“开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的人的生活内容”，冷却了高尔基寻求“更好一点的东西”的热望。一个偶然的机，他把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的触角，本能地伸进了文学领域。

“善良号”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激起了高尔基读书的兴致。用高尔基自己的话说，促使他“相信书籍具有极其伟大意义并爱上了它们”。在高尔基眼里，斯穆雷的一箱子书，“可真是世界上最奇异的书库”。离开轮船后，在高尔基的生活中，便出现了一个新的，终生使他心醉神往的天地。

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子，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祖父；福楼拜塑造的普通厨娘形象，勾起了高尔基对外祖母的思念；普希金的诗，使他“充满了一种贪婪的心情——总想一口气跑遍这突然闯入自己生活中的美好世界”；莱蒙托夫的《恶魔》对圣像画师们产生的心灵震撼，使高尔基领略了文学拥有的强大感染力。当然，高尔基也读过无数的坏书。在当时的下新城里，高尔基凭其所能借到的图书中，大量的还是法国与英国的低级趣味的惊险小说。这对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读者说来，无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高尔基的独特的力量就在于，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书籍里，他都能弃伪识真，从纷乱复杂的生活与文学现象中发掘出鼓舞自己追求真理的动力。不幸的，沉重的现实生活，与书本中美好的、但是虚构的浪漫生活，在他心中的猛烈较量，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他要抛弃使他厌恶的小市民社会，他要进入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

“ 我的大学 ”

一八八四年，高尔基怀着这种激情，首次告别家乡，来到了喀山。凋敝的经济、大量的失业工人、如潮水般破产的农民，畸形得令人可怕的流浪汉王国，这个冷酷的现实迅速粉碎了高尔基的求学幻想。他明白，自己是从小染缸落入了“一个大染缸”。他在喀山，经历了自己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最为紧张、同时也是危机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使他必然地接近俄国的流浪者。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比我所说的还要可怕的现象”。另一方面，寻求真理的愿望使他接触到了俄国的民粹派。对他来说，这既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

在喀山将近四年的时间里，高尔基先是当过流浪汉，在伏尔加河口干零活；随后作过面包作坊的工人，干过花匠和清扫工，甚至还在一家地方剧院充当过合唱队员。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的特征，在高尔基生活的社会底层，极其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这无情而又可怕的事实，终于又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使他从小商人杰林柯夫的杂货铺中走了出来，进了小商人杰林柯夫的杂货铺。

当时的喀山，是沙皇流放政治犯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政治犯中，主要是民粹党人。他们或从赴流放地的途中出逃，或从流放地潜回到喀山，同这里的大学生们一道继续从事革命宣传。杰林柯夫的杂货铺，便是当时喀山无数秘密读书会中的一个地点。还是偶然的机缘，使高尔基同它接近了起来。他破天荒第一次遇到这种人，他们的生活兴趣大大超出了对个人生活的关心，他们完全懂得劳动人民的疾苦，所谈论的是必须改变现实生活。高尔基觉得，他可以将自己的理想同他们这些人的使命联结在一起。但当他读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德林等人的政论文章后，更重要的是他运用了民粹派的理论指导了实践后（1886年高尔基曾在谢苗诺夫面包坊里组织过一次罢工），和他平生第一次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塞耶夫接触后，他渐渐地感到，从民粹派那里“只能学到一些词藻。喀山面包店老板谢苗诺夫教给我的马克思主义，要比书本上教的又多又好。”当然，他这里强调的还只是通过生活本身接近马克思主义。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这时他已读过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但还未能帮助他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在经过兴奋、冷静与厌倦之后，高尔基不是被民粹派抛弃，而是自己抛弃了民粹派。他重又陷入了比肉体折磨更为可怕的精神痛苦之中。在近似封闭的思想禁锢下，高尔基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曾试图用自杀来解脱这一切。

高尔基在喀山时期的主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对生活与文学道路的进一步的探索。他后来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宣传与组织才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锻炼的。当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次组织罢工外，高尔基更多地是以一个政治鼓动者的面貌出现于工人、农民中间。高尔基后来回忆道：“鬼才晓得，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但是无疑，讲的都是能够激发他们信心的一些话，使他们看到，有希望过上另一种比较轻松、有意义的生活”。由于他在杰林柯夫杂货铺的秘密活动，他第一次受到了警方的注意。喀山宪兵司令部从此便建立了关于“送面包工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别什柯夫”的档案。在这期间，他还随同费多塞耶夫来到喀山附近的克拉斯诺维多夫村进行“唤起农村的觉醒”的革命鼓动工作。从这段实践过程中，他认识到自己

摒弃民粹派的理论是正确的。但他还未找到引导自己走向真理的出路。他这时多么需要一盏指路的明灯啊！

“我要了解俄国”

一八八八年深秋，高尔基曾步行到察里津住过一阵。这期间，他当过车站守夜人和过磅员。一种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日益强烈。他想以此来对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恼。他也曾组织过一个都是工人参加的“自修小组”。但他的处女作——长诗《老橡树之歌》还未得到权威们的鉴赏；他的“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生活的主人”的预言，在工人眼里还是些“鬼话”。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高尔基一时竟想去请教列夫·托尔斯泰。于是，他辞掉铁路上的差事，从察里津出发，直奔莫斯科，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国土漫游。他未能在雅斯纳雅——波良纳与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大街的寓所见到托尔斯泰。

从莫斯科回到家乡后，他在下新城结识了“政治移民”乔金和索莫夫。他们使高尔基对民粹派的政治面目的认识更深刻了。由于同这两个革命者的联系，高尔基第一次被捕入狱。因为证据不足，高尔基不久便被释放。出来后他即刻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找当时住在下新城的柯罗连科评论他那首长诗。然而，等待他的，不啻是毁灭性的打击。柯罗连科忽略了长诗“号召人们英勇奋斗、使浸透了血泪的大地苏醒过来”的浪漫主义内容，只指出了语言方面的许多不足。处女作受到冷遇，使高尔基当时“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不知道了，此时只觉得无地自容。”他当时便下了不再写作的决心。“而且确实确实，我在下新城这段时期——将近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写”。这次打击仿佛要再次摧毁这位顽强探索者的信念。然而，高尔基不仅战胜了这些精神上的挫折，还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了整个俄国。他要带着种种暂时还不理解的问题，去“了解俄国”。高尔基开始了国内的又一次漫游。

一八八九春，高尔基离开了下新城，来到伏尔加河畔，望着已经融化了的一江春水，高尔基的血液仿佛在血管中沸腾着：“到生活中去，到人间去寻找力量，以释我心头之重负”。“我决定亲自去看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一个油布包。包里除了一些准备写诗用的纸张，就是用来来录民间口头创作的本子。看得出来，经过这番振作，高尔基雄心勃勃地踏上了政治与文学的两条大道。

高尔基搭船到达察里津，然后从他曾作过守夜人的费龙诺沃车站出发，直奔顿河草原；从罗斯托夫出发，经库尔斯克、哈尔科夫，横越乌克兰到奥德萨；又从那里取道克里木、北高加索，一直到达格鲁吉亚的首府第比利斯。在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辽阔的草原、浩瀚的大海、明媚的阳光与清新的空气——是他最亲密、最忠诚的旅伴。他走遍码头、矿山、乡村、城镇，结识了当时俄国各种类型的工人、农民及流浪汉。他每到一处，就在那里做工谋生；用他那鹰一样的眼睛观察人民的生活，用他那火一样的激情从事创作。经过这次漫游，高尔基的意志更加坚定了，眼界更加开阔了，知识更加丰富了。为高尔基所特有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也正是在这千难万苦的磨炼中，开出了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花朵。在到达这次漫游的终点站第比利斯后不久，他向人民献上的第一部作品是浪漫主义的短篇《马卡尔·楚德拉》。可以说，留在他身后的绵延大道，就是高尔基从人民中间一步步迈上文坛的生动象征。

一八九一年十月底，高尔基到达第比利斯。地方当局用来“欢迎”这位远方来客的第一个举动，是因他来此地的目的不明而拘留了他。取保获释后，高尔基当锻工，作统计，还同“饥民”一起修过公路。他积极参加当地的政

治团体“公社”，并率领公社成员在当地群众中进行宣传。尽管当时的宣传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在第比利斯这一段经历仍是他平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一八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新历十二日）的《高加索报》上，刊出了署名马克西姆·高尔基（俄文“最苦命的”之意）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四十年后，当高尔基参加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他在第比利斯回顾道：“这个城市，是我开始文学活动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我迈出了文学道路的信心不足的第一步。可以说，正是祖国的宏伟壮丽的大自然，正是格鲁吉亚人民那种浪漫主义柔情，正是这两股力量推动我，使我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文学家”。他在这里结识的“政治移民”亚历山大·梅夫季耶维奇·卡柳日内，对帮助他认识自己的文学实力、鼓起勇气迈上文坛，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卡柳日内也未必能想到，他为高尔基联系出版的这篇小说，不仅成了高尔基本人文学活动的起点，而且更是俄罗斯文学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震动了沉闷、黑暗的俄国文坛的这部浪漫主义的散文诗作，以其歌颂自由与斗争的满腔激情，演出了高尔基与众不同的创作主旋律的前奏曲。俄罗斯文学的新序幕也将随之拉开。

九十年代的创作

一八九二年深秋，高尔基在离开家乡三年多之后，返回了下新城。他先是回到以前自己曾在那里当过办事员的拉宁律师处谋职。在高尔基看来，拉宁是他生活、乃至思想探索时期的又一重要襄助人。高尔基曾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献给他。随后他还写过一篇《少女与死神》。这时期他的创作热情极高，白天出庭帮办，晚上在律师家干活，只能在夜深人静之后，陶醉在“涌上心头的一种奇特的忘我创作的热流”中。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高尔基似乎一篇作品也未发表过。据他自己回忆，这时期他写的大量习作，都被他亲手毁掉了。直到一八九三年八月五日，《俄罗斯新闻》这份当时颇有影响的省报上，才刊出高尔基的另一篇作品——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俄罗斯文坛的人物长廊里，第一次增添了一种新的流浪汉典型。一八九四年，高尔基便辞掉了办事员职务，全力以赴地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地方报纸《伏尔加纪事》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高尔基的《关于撒谎的金翅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的故事》、《倒霉鬼保尔的故事》、《阿尔希普爷爷和连卡》等寓言体小说、连载小品文及短篇小说。高尔基的名字开始在伏尔加河流域传开了。但他这时的生活，却还需要靠借债维持。还是柯罗连科极力推荐，为高尔基在省报《萨马拉日报》谋到一个专栏作家的职务，解决了生活问题，使高尔基有可能从事文学创作。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萨马拉日报》的《随笔与杂拾》栏目里，登出了高尔基的第一篇“就职演说”。不久之后，他又接过了《漫谈》小品文专栏。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萨马拉出现了一个干预他们的生活、抨击他们的社会风尚的“叶古杰尔·赫拉米达”。这位政论兼讽刺专栏的作者，无情地揭露了社会各个黑暗的角落。自幼便对这个社会无比憎恨的高尔基，此刻是站在更高一层来批判它了。他甚至在审查机构严格控制的官方报纸上，影射资产阶级的“死期行将到来”，暗喻工人革命的“快乐的星星之火，定会燃成熊熊烈焰”。这种行为，曾使当时沙皇政府的出版总局局长要求萨马拉省省长，速令今后不得在地方报纸上刊载煽动工人敌视厂主的文章。

萨马拉时期，是高尔基作为政论家初露锋芒的阶段，作为文学家是第一个重要的创作时期。这时高尔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的深入观察，大大加强了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双管齐下的创作方法，是高尔基早期创作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一八九五年发表在《萨马拉日报》上的《伊则吉尔老婆子》这部短篇，可说是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的代表作。高尔基对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体现在对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的借用上。而他对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通过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形象来完成的。

在《伊则吉尔老婆子》这篇作品中，有两个显明对立的传说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腊拉。腊拉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杀死了无辜的少女，从而遭到人民的惩罚和唾弃。他在人民的生活中失去了位置，在草原上游来荡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像影子一样的人。第二个故事讲的是集体主义英雄丹柯。他年轻、勇敢，对人民怀着强烈的爱。当人民需要自己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着的心，把它高高地举在头上，照亮了拯救人民的道路。

这篇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在关于腊拉和丹柯两故事之间，作者插进了

故事叙述人伊则吉尔老婆子自己的生活史。伊则吉尔老婆子本来也可以在生活中建立功勋，使生活过得有价值，但她没有伟大的生活目的，在爱情的游戏中虚度了一生。因此到头来，她未能成为丹柯，却变成了腊拉式的空虚的影子。作者通过老婆子这个现实主义的形象，把两个浪漫主义的传说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生活教训。作者以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忘情讴歌，批判了猖獗于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生活原则。

为高尔基所独创的这种新的美学理想，更加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散文诗作《鹰之歌》（1895）中。作品中反映人民渴望斗争、向往自由、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这种浪漫主义战斗激情，远远逸出了文坛，在斗争着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列宁曾多次引用这诗中的名句，使它们成了最有力量的格言。

一八九五年六月，高尔基的作品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刊出了他的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切尔卡什》。这是作者应柯罗连科之约创作的第一部“大一点的东西”，但却因作者塑造的流浪汉形象过于新颖而受到编辑部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刁难。小说描写某码头上的“偷儿”切尔卡什雇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加夫里拉一道去偷东西。去时，加夫里拉十分害怕，但后来看到到手的钞票时，却见利忘义。他先是哀求，后来甚至企图谋害切尔卡什以得到这份不义之财。切尔卡什发现他存心歹毒十分气愤，但仍怀着怜悯和厌恶的心情把钱扔给加夫里拉。作者通过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揭露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对人的心灵的毒害。他指出，受这种欲望支配，人就会变得下贱，不齿于人类。摆脱这种束缚，便可能使灵魂升华高尚。在切尔卡什身上，体现了流浪汉形象共有的政治特征：即他们虽无立身之地，却满怀与黑暗社会、腐朽道德作不懈抗争的精神。这无疑是否定了俄国官方宣扬的俄罗斯人民固有的性格是“驯顺”的反动说法。难怪小说发表前，屡遭编辑部的非议，他们既要求将切尔卡什变成加夫里拉式的贪心鬼，又要求将加夫里拉改成民粹派所能接受的“高大农民形象”。高尔基捍卫了自己为新文学塑造人的道德魅力的权力。但他也并未将这些流浪汉理想化。作者指出，就没有远大的生活目的这一点来说，切尔卡什与加夫里拉同为那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小说开篇时，高尔基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码头上的劳动场面。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性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一背景上，揭示了切尔卡什的个人反抗的局限性。

继《切尔卡什》之后，高尔基还写了《有一次在秋天》、《我的旅伴》、《沦落的人》等流浪汉题材的小说。高尔基后来答读者问时说：“我对‘流浪汉’的偏爱就是出于我想描写‘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写干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之愿望”。这也可以说是在萨马拉时期高尔基文学活动的主导倾向。由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尚未形成，高尔基即使看到了“码头”上那种阶级对立，然而毕竟还未想描写已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工人。另外，九十年代的俄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本国工人运动尚未紧密结合起来，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暂时还只能齐头并进，而尚未能融合为一体。但它们又已经完全是源于俄国文学传统，而又高于古典艺术手法的新概念了。

一八九七年，高尔基在萨马拉同卡特琳娜结婚。这是一位中学毕业后在《萨马拉日报》担任校对的美丽的姑娘。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他便是高尔基的独生子马克西姆。

一八九八年，高尔基首次出版了自己作品的单行本。两本题为“散记与短篇小说”的集子，收录了他本人已经创作出来的七百多篇作品中的二十余篇佳作。这是作家文学声望最终得以巩固的标记。高尔基的名字从此响彻了俄国。

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所诞生的 ——高尔基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一八九九年，高尔基首次来到彼得堡。仿佛是给踌躇满志迈入下一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兜头泼了一盆冷水，高尔基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在俄国资产阶级鼎盛时期便大胆预示其必然衰落的作品，竟然是在沙皇政府的中心——彼得堡连载问世的。高尔基能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这一点表明作家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一开始便已具有了更大规模的艺术概括力。

高尔基通过描写一座大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势力后大踏步的前进，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基本过程。在为金钱抹煞了人的可贵品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小说里的中心人物——福玛·高尔杰耶夫这样的阶级叛逆。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仿佛是代表作者，对资产阶级进行了面对面的抗议和抨击。尽管福玛有这种行为，但他还是游离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之外，因而也就未能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稍许触动，但却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早在上升时期便已存在了内在的矛盾。福玛本是代表资产阶级未来的希望，但他却以自己的反叛行为动摇了资产阶级相信自己的制度是“永世长存”的信念。小说的这一主题，无疑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现实意义。

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三日，高尔基首次见到列夫·托尔斯泰。但这时，他已是俄国文学新阶段的开拓着了。

一九〇一年四月，高尔基发表了散文诗《海燕》。它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时那种革命气氛的最生动的反映。矫捷的海燕不仅飞遍俄国传递着伟大革命行将到来的信息，也成了无产阶级在俄国文坛上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象征。列宁对它在俄国革命运动中起到时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些年间的高尔基本人，恰似这海燕，勇敢地在政界与文坛，搏击着时代的风云。

上述这两部作品，给高尔基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他在下新城的住宅成了全城一切社会、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联络中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的组织活动，捐款资助列宁创办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并撰写抨击时政的文章。因他为工人购买油印机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而再次被捕。沙皇政府将他变相流放到阿尔扎马斯。在去此地之前，高尔基因需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去了克里米亚。在高尔基被押解离开下新城的当天，爆发了该城革命群众的第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他去流放地的沿途，因为人民迎送他并抗议沙皇政府而引起了一连串的骚动。在他到达克里米亚后不久，沙皇亲自下令取消了高尔基候选科学院荣誉院士的资格。而事实上，高尔基的世界声誉已经无可辩驳地形成了。仅在德国，一九〇二年便有六家出版公司同时竞相出版他的文集。反革命的暴力企图以种种手段扼住“海燕”的喉咙，而高尔基却以更响亮的歌声作了回答。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

一九〇一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以俄国当时的戏剧最高水准，上演了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小市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人公尼尔）。剧本的主题是揭示小市民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观。它以自己对于市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庸俗气的无情批判，以其塑造革命工

人形象的崭新尝试，划清了同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界限。表面上看，资产阶级两代人的矛盾是剧本的基本冲突。但他们维护旧制度与敌视革命的一致立场，又表明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敌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火车司机尼尔“坚信自己有力量、有权利按照他尼尔的想法改变现实及其一切制度”（高尔基语）。尼尔作为社会冲突中进步力量的代表出现在高尔基的笔下，不仅形象地宣告无产阶级在俄国已经投入战斗，而且标志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探索正面人物形象的新阶段。尼尔这一形象在俄国舞台上的出现，使政府感到极大的惶恐。他们不仅删砍剧本中的台词，还限制演出的场次与售票的范围。彩排的当天，政府委员全部到场“审查”，宪兵军队将剧场团团围住。连剧场的验票员都换上了便衣警察。而外省上演这个剧本，每次都要引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尼尔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首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但他还只是一种新人的雏型。高尔基未能在其劳动的过程中展示他，自然也就未能将整个无产阶级引入文坛。

一九二二年夏天，高尔基在流放地阿尔扎马斯县城写出了他最重要的戏剧作品《底层》。它也以流浪汉生活为题材，但却是高尔基对社会“底层”二十年观察之总结。

二十世纪初叶，正是巨大的经济危机袭击俄国的时期。农村破产，工厂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又沦为流氓无产者。

《底层》所描写的就是被疯狂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掷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像野兽一样栖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里。帷幕拉开，我们看到的是俄国舞台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场面。这里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戏子、锁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运工人等等。他们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权利，失掉了爱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这个已被烟熏得乌黑的地窖一样的地下室里。这个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的物证。

对高尔基来说，流浪汉的题材并不陌生。但在《底层》中，他是更深刻地处理了这个题材。作者揭露了当时流行于俄国社会上的“安慰哲学”，批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出了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摆脱悲惨命运的严重危害性。

剧中扮演安慰者角色的是游方僧鲁卡。这个剧本的社会意义，就是为彻底揭露鲁卡的安慰哲学服务的。

在第一幕里，作者展示柯斯狄略夫夜店里所有的人物。在这里，个人有个人的遭遇和痛苦；个人有个人的幻想和希望。这样就为鲁卡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一俟他到来，店里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黄金的美梦”。他要他们忘掉沉重的现实，陶醉在空虚的幻想里。妓女娜思佳生活很痛苦。她抱着遁迹的想法，而躲到言情小说里了。鲁卡不让别人嘲笑她。他安慰她说，要是你相信你有真正的爱情，那你就有真正的爱情。他安慰戏子，说有免费治疗酗酒症的医院，可以使他痊愈并恢复其演戏的才能。他劝小偷贝贝尔领着他心爱的姑娘娜塔莎到西伯利亚去，说那是块“黄金宝地”，到那里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到第三幕的结尾，现实的矛盾爆发，人物中间发生冲突。贝贝尔失手打死了店主柯斯狄略夫，鲁卡也吓跑了。后来贝贝尔下狱，戏子听说无处

治疗他的酗酒症而绝望自杀；娜思佳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整个剧情的发展彻底宣告了鲁卡安慰哲学的破产。

高尔基不仅利用剧情的发展逐步揭露鲁卡的谎言，而且通过穷途潦倒的小职员沙金之口，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鲁卡哲学的反动实质。他说：“我看透了那些谎话！……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的人靠撒谎掩饰自己……谎言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还针对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讲出了关于人的崇高使命和尊严的一段名言：“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人啊！这个名字美极了！他真光荣！”“应该尊重人！不要你去怜悯……不要拿怜悯去伤害人的尊严”。

《底层》同样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最强阵容排演的，当然也同样受到了沙皇政府的无情的压制。但它上演后在国内引起的轰动，却是史无前例的。俄国戏剧的发展，从此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高尔基从此又赢得了杰出剧作家的世界声誉。几十年后，高尔基论述他的戏剧创作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时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深刻的、空前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破坏与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时代”。高尔基的全部剧作，都是这种时代的戏剧性的天才记录。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高尔基写出了《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三个剧本。这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同革命和人民的关系的一组现实主义剧作。其中的《避暑客》是一部着力谴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斗争，并在革命暂时失利时从革命阵营内部攻击革命的作品。剧木对当时还标榜自己是“精神贵族”的这类伪善者的无情的揭露，引起了自由主义分子的群起攻讦。这表明，高尔基的批判又击中了要害。

一九〇五年，可说是高尔基同沙皇专制政府的斗争短兵相接的一年。俄国工人阶级从这一年年初，便开始将自己的“政治要求代替了经济要求”。元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在向沙皇请愿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高尔基亲眼目睹了“流血的星期天”这幕惨剧。反动当局灭绝人性的暴行，使高尔基义愤填膺。从街头回到他的住处，他当即起草了一份《告社会人士书》。元月十二日，高尔基被逮捕。他被解往彼得罗巴甫洛甫监狱，关进了专门关押要犯的单人牢房。整个俄国，甚至整个欧洲的进步舆论，都为解救高尔基发出了怒吼。高尔基的政治形象直接同俄国工人运动联在一起了；声援他的活动，自然成了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匆忙释放了高尔基，将其流放到里加了事。

在等待所谓审判期间，高尔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讲过：“如果开庭审判，而且我被判罪，那我就有了最好的理由，可以向全欧洲讲一讲，为什么我非要做一个革命者”。高尔基于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观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他自觉投身政治变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早在一九〇一年，他便同列宁携手创办《火星报》。一九〇五年秋，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高尔基再次协助列宁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生活》。虽然在这些年间，列宁与高尔基未曾见面，但都通过第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宁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等重要文章。这无疑也为高尔基的战斗道路指明了方向。高尔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谈谈小市民习气》等政论文章，立即得到列宁的肯定。当时的法国《人道报》便将《新生活》报称为“列宁和高尔基的报纸”。一九二八年，高尔基

回忆起这一时期时说：“真正的革命性，我是在布尔什维克里，在列宁的文章里，在跟着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里感觉到的……”高尔基在社会实践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十几年来不懈寻找的真理；而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造就了自己的勇猛的政治战士与伟大的文学旗手。高尔基于一九一五年下半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与高尔基在彼得堡首次见面。在高尔基生命的航船上，从此有了罗盘与舵轮。

在随后到来的一九一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中，高尔基完全是以一个组织者兼战士的身分出现的。他在起义开始的当天赶到莫斯科。他将自己在那里的寓所提供给工人义勇队制造炸弹。他捐款并募集大笔的钱去购买武器。与此同时，他从未中断过撰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的斗争。起义即使失败了，他仍在大量散发的传单中满怀信心地宣布：“无产阶级没有被打败，革命充满了希望，……俄国的无产阶级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讲得千真万确，这些话将来一定会被正直而公正的历史学家所证实”。

一九一六年二月初，高尔基按照党的决定，到国外去为党筹划经费。更主要的，是要利用他的影响，通过他的宣传，赢得国际上的民主力量对俄国革命的支持。高尔基经芬兰、瑞士、德国和法国到达美国。在那里，他住了三个半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社会作了实地考察。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尔基这次欧美之行，就其政治与经济目的来说，均未圆满完成。高尔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出的“不要给俄国政府贷款”的呼吁，没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法国向沙皇政府提供了二十亿法郎的援助。高尔基在美国募集的款项，总数也不过一万美元。美国大资产阶级甚至采用逐出旅馆的手段阻挠高尔基在美国的活动。但高尔基仍针锋相对地战斗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之中。他接连写出了九篇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章。其中的《黄色魔鬼的城市》，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深刻暴露西方“文明”的政论文章。高尔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象化地向全世界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本质，使这篇激情洋溢的政论散文，载入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史册。

高尔基在美国期间最重大的收获，是写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母亲》。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坛上，表现了工人将成为自己国家未来的主人，工人是新的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题。它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批正面典型人物，标志着高尔基创造时代新人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小说中巴维尔及其母亲符拉索娃，是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困苦磨难终于登上人类政治舞台的形象体现与生动记录。在这部长篇的创作中，高尔基自觉地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因此小说虽然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但却反映了作家对革命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因此，《母亲》对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具有无比强大的政治鼓动力，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列宁的肯定与热烈赞扬。他称《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阅读这部小说会有很大益处的。因为这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典范作品，因此它的发表，自然受到了反动派的极力阻挠。小说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美国杂志上问世时，已被删节很多。至于国内的读者，当时只看到过小说的第一部，而且这一部分也很快被当局收缴上去。但国外的版本与保存下来的俄文片断，即使是以残缺不全的面目流传在国内，也仍像

地火一样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革命热能。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母亲》才能完整地出现在本国读者面前。

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仇敌》，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集体出现在俄国的戏剧舞台上。两个阶级的公开冲突，首次构成了高尔基剧本的主要情节。剧中工人集体先是自发地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斗争，杀死了厂主，但又要将工厂毁掉。布尔什维克党人辛佐夫及时出现在罢工队伍中，使这场斗争避免了蹈入无政府主义轨道的悲剧。虽然剧本是以罢工的暂时失败作了尾声，但在斗争中已经团结战斗在一起的工厂工人，以其政治觉悟的成熟和阶级力量的壮大，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对这样一部杰出的革命剧作，反动派当然也是予以绝对禁演的。

《母亲》的发表（当时虽然仅是第一部），使俄国反动派意识到，高尔基事实上已经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以“散布有害文学，煽动犯罪，煽动工人仇视有产阶级，教唆造反，图谋叛逆行为”的罪名，对高尔基实行起诉。彼得堡的地方法院还发出对高尔基的通缉令。而早在这之前的上一年，高尔基便已接受党的指示，来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岛进行政治避难。他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流亡生活。

“迷过路的人”与列宁

一九一五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开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九一七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工人运动浪潮的暂时低落，尤其是白色恐怖的空前猖獗，使革命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们不仅大批逃离革命，而且还掉转头来，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俄国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唯心主义哲学和颓废派文学横行一时。俄国共产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也相当激烈。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一伙人，在政治上反对列宁的革命策略，主张从国家议会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放弃合法的斗争权利而全部转入地下，从而形成了“召回派”；在思想上，他们鼓吹马赫主义，混淆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界限，形成了“造神派”；在组织上，他们搞派别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通过办“党校”，培植派别势力。以列宁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核心，顶住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也挫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企图。

高尔基自一九一五年起至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基本上站在了列宁一边。他对党外反动势力发动的文化围剿，予以了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党内，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队伍，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后来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他在这一时期，曾是个“迷过路的人”。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几年中，高尔基的政治与文学实践，有了本质性的飞跃，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还有许多欠缺。加之他远在国外，脱离阶级斗争的实际，因此，他曾在思想上接受过波格丹诺夫等人哲学中的反唯物主义观点，宣扬过“造神说”；也使得这位《母亲》的作者被资产阶级的反动舆论所左右，顽强地宣扬过“科学救国论”，甚至达到否定十月革命必要性的程度。正是列宁，始终为他紧紧地把握住前进的航向，引导这艘几度濒临搁浅的无产阶级文学战舰，顺利渡过了险滩。

一九一七年，高尔基以列席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直接而广泛地认识了共产党人的政治面貌，与列宁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在回到喀普里岛上后，高尔基同列宁曾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间，中断了一年半的通信联系。这主要是由于高尔基同当时也在喀普里岛上流亡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于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起初，列宁曾想请高尔基作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文学批评栏的撰稿人。高尔基未接受这一重任。这并非是由于他当时像列宁所猜测的那样，“正在从事严肃的、巨大的著述工作”，事实上他当时正在写宣扬“造神说”的中篇小说《忏悔》。后来，他将有着同样观点的著名文艺理论文章《个性的毁灭》寄往《无产者报》。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份，表示不赞成在该报原封不动地刊登这篇文章。四月份，列宁为了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斗争，亲自前往喀普里岛。他同高尔基进行了长谈。从这次见面后开始，两人便未再通信。

高尔基在《忏悔》这部作品中，通过农民出身的马特维对所谓“正确信仰”的追求，阐述了“人民能创造奇迹，人民就是神”这样一种观点。高尔基的本意是要通过对人的信仰的宣传，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因此在书中，他同时也否定了官方的教会。但正如列宁严肃指出的那样：“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

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如果按照高尔基的“新宗教”去理解人民，那么他们只能是脱离现实斗争、盲目崇拜自身力量的新的造神者。无疑，在当时的革命形势的背景下，向人民灌输这类思想，起了涣散革命斗志的有害作用。这表明，高尔基当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尤其是在人的本质及宗教的本质等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

高尔基在这一期间，还为“党校”学员讲授文学课，他没意识到自己这种活动本身有分裂党的性质。由于他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以那时他还一直在为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分裂”感到忧心。他错误地指责双方“都是虚无主义者”，认为“这种分裂的程度并不次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一九一九年十月，喀普里岛“党校”中，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与波格丹诺夫的拥护者们终于发生分裂。在他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使高尔基更加感到难以理解，并为之痛苦。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于十一月十六日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十分及时的长信。列宁承认自己将高尔基也划入“新派别的最坚决的分子”是错误的。

列宁以革命导师的坦荡胸怀，以对高尔基的真挚的爱护，主动伸出了恢复友谊的手，并在这以后的频繁通信中，热情帮助高尔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当列宁再次来到喀普里岛时，他同高尔基就一起离开这里了。高尔基终于声明，他同波格丹诺夫“断绝了一切往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和他们全都断绝了关系”。

高尔基在理论上犯过的错误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上；但对颓废派文学，他始终是反对的。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在这一阶段也未停止过创作。他从列宁对《母亲》的高度评价中，看到了自己应当走的路。他在一九一九年之前，写出了中篇小说《夏天》等多部作品。《夏天》以其对农村题材的独到开掘而树新。觉醒的俄罗斯农村。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农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生活气氛，农村妇女瓦丽雅的形象，这一切都以一种时代的特色，取代了当时清一色的对农村的晦暗描写。

集中批判小市民阶层的庸俗气，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高尔基热衷的创作主题。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写了两部内容有直接联系的中篇：《奥古洛夫镇》和《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这是作家计划描写俄国外省偏僻城镇小市民生活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前者描写了一九一五年革命浪潮对这座昏昏欲睡的小城的波及。这里是被世人遗忘了的地方，金钱欲，利己主义、忌妒、暴行、愚昧与保守，永远落后于时代的小私有者的种种可怕特征，构成了封建俄国极为典型的一幅缩影。在小说发表后，“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奥古洛夫精神”，便成了专指一种束缚俄国社会发展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代名词。革命思想的到来，在这潭死水中激起的却是足以使其遭受灭顶之灾的腥风恶浪。市井无赖瓦维拉·布尔米斯特罗夫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径尽情享受了“革命”带给他的自由；“土瘠”马雅金一家和小康家庭的库古罗夫、巴祖诺夫等人，唆使布尔米斯特罗夫弹压小城市中开始觉醒的人们。《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分四部分。它以马特维在一生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政治影响，折射了社会变革风云对“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的递进冲击。在第一部里，马特维的父亲以最典型的小市民习气，极力影响着主人公的性格与世界观。但他的后母与家人、退伍兵普什卡尔，却从另一面，以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整个俄罗斯的爱，去影响主人公。第二部中，民

粹党人曼苏罗娃来到镇上定居。她曾一度以民主主义的思想，开导过马特维及城镇小资产阶级，唤醒他们去寻求社会道德。但她在陷入与马特维的感情纠葛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力克服这种势力的影响。她以离开马特维及小镇为结局，表明民粹派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玛克·瓦西里耶夫是书中惟一富有经验和力量的革命者。他在曼苏罗娃走后，来到奥古洛夫。他组织起进步的学习小组。但他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宣传中虽然有着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最终还是未超出民粹派的思想樊篱。因此，他在奥古浴夫人之间从事的这种活动，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小说的第四部中，一九一五年革命使年轻的一代人自觉地起来同窒息人的沉闷气氛作斗争了。而小说的主人公马特维，却在“新的一天开始了”的春日黎明中，结束了他的庸碌无为的一生。他在小说的后半部中，基本是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猪狗”生活。他不仅终生未能燃起追求新生活的热情，而且还始终散发出腐蚀青年、甚至能毒害革命者的迂腐气。作者通过这两部作品及玛特维等形象，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见解：在这种地方，这批人非但本身无力摆脱它的停滞状态，而且还能具有窒息革命精神的可怕力量。高尔基得出的这种结论，是他考察俄国社会几十年的正确认识。而他对俄国小资产阶级惰性的嫉恶如仇，又使得他过分夸大了这种力量的反革命作用。他在文学中的这种倾向，导致了十月革命到来时，他犯的又一次政治错误。

在俄国文学最消沉的年代里，高尔基的这两部作品，恰似以更沉闷的雷声，有力地震撼着文坛。小说不仅表现出高尔基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彻底清算，还像《底层》那样，以严峻的现实召唤了人们为使自已不至于成为“奥古洛夫人”而斗争。

高尔基在回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后，曾满腔热情地希望创办一份大型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他也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出版社。但由于资金不足，缺乏印刷条件而未能实现。在一九一一年，布尔什维克办起了第一份合法的报纸《明星》周报。在其创办的不长时间里，高尔基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他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为适应日趋活跃的革命运动的要求，写了一组洋溢着重新高涨起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意大利童话》。作者以意大利劳动人民的生活为底色，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为之向往的光明的未来，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个性。列宁曾评价它们是“精彩的‘童话’”和“革命传单”。

一九一二年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正式宣布成为独立的政党。列宁曾及时地写信给高尔基，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一九一二年四月，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创刊。高尔基在该报发表了不少作品，并为编辑部筹集过资金。与此同时，他还主持过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的小说栏，他的《俄罗斯漫游记》，就曾在这里发表过。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宣布大赦。列宁看到高尔基属于所涉及的文化人物，便写信劝其回国。高尔基因当时肺病恶化拖延了几个月后，于年底回到了彼得堡。

国内人民是将高尔基作为革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来欢迎的。他的归国，可以将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紧密地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这杆大旗下。因此，高尔基回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自己的文学队伍，培养自己的文学新人。他抱病回复大量的初学作者的求教信，发表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文章。一九一四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无产阶级作家选

集》，并在序言中预言革命无产阶级的艺术繁荣时期即将到来。他尽全力支持《真理报》的工作，为它捐款撰稿。为反对仍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尔基通过他参与领导的《帆》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批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小册子。列宁担任撰写金融资本部分，这就是后来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关怀青年的成长，他还邀请国内外一批著名作家写出一套名人传记。就是在请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撰写《贝多芬传》时，高尔基与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

还在高尔基旅美期间，国外就有人想让高尔基写自传，并以十万美元的代价购买高尔基的自传版权。想到可以为党搞到这样一笔可观的经费，高尔基当时也曾想动笔撰写。但直到一九一三年回国前，他才写出了《童年》。一九一四年初起在《俄罗斯言论报》上连载后，顿时引起文坛的震动。一九一六年，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二的《在人间》在《纪事》上发表。它们给人与众不同的印象是：作者不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同时还广泛地再现了上一世纪末期俄国的社会生活。高尔基虽然描写了“这些铅样沉重的现实生活中的丑事”，但却使人坚信：“俄罗斯人的灵魂……一定能够消除它们”。

东方的地平线上，十月革命的曙光已经透出了微熹，高尔基恰是在这一时期，又陷入了政治迷惘的昏暗中。由于同转入地下紧张准备起义的党失去了联系，高尔基又陷入了《纪事》编辑部中孟什维克分子的影响之中。这一回，他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去分析形势，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合时宜”的错误结论。二月革命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既鼓吹目前“应看重资产阶级的作用”，又呼吁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尽快缔结和约。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他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低估了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力和勇气”。的确，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却对他一直严加戒备的俄国农民的“奥古洛夫精神”作了过分的估价。他担心无产阶级——“俄国这独一无二的积极力量……就像是一把盐摔进了农村这样一个淡水的泥塘里，无声无臭地溶解掉，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在摈弃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后，他武断地将全部知识分子认作了革命的首要力量。而且他还主张要“刻不容缓地、有计划地、全面地和坚决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使人民在文化之火中“受到锻炼，挺起腰板，完全摆脱受奴役的状态”。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还撰文大谈他的“只有文化才能救国”论。

列宁对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即刻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他在著名的《远方来信（之二）》中，明确指出“这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列宁针对高尔基的“倡议”回击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于向妓院鸨母宣传行善积德”。但高尔基拒不接受列宁代表党所作的批评，并在四月份加入了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编辑部，从此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以其天才预言家及伟大战略家的革命胆识，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高尔基在彼得堡迎接了十月革命，但却是带着上述那种疑惑，进入了新社会。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右倾立场，而是极力从社会变革所势必带来的暂时混乱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否认这一革命的依据。布尔什维克这时从地下转为公开的活动；高尔基的身边，却麇集了革命前处于“地上”的偷安分子。他们专门向高尔基提供“世风日下”的流言蜚语。而高尔基使

不加分析地写入他的文章，发表出来抨击革命。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子里，不仅未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倾心尽力，反而站在它的对面，评头品足地指责它。高尔基实际上成了小资产阶级在当时“诉苦与发牢骚的中心”。他本人未能认识到，当十月革命已经成为现实之后，他仍抱着这种否定的态度，就等于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位置之上。列宁在不得不下令封闭高尔基的讲坛《新生活》报时，他却十分自信地对自己身边的同志说：“高尔基是我们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看出：“高尔基始终是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的人。高尔基所沉湎的那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用资产阶级反人道主义的事实才能予以彻底揭露。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血的事实抹去了高尔基脸上“怜悯的眼泪”。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当即给列宁发去了慰问电，并在不久之后前往莫斯科看望了列宁。这一次，是他主动结束了从一九一三年底到这时为止的将近六年的未见面、未通信的同列宁的“冷淡”时期。高尔基当面向列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列宁以“一个严师和一个和善的、体贴入微的朋友的态度”，接受了他这个“迷过路的人”的悔悟。高尔基后来说：“从卑鄙地行刺弗·伊（列宁——引者注）的那一天起，我觉得自己又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就是这样，不仅以自己的思想，甚至以自己的鲜血，哺育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文学创作与理论活动的全盛时代

一位当时在农村同富农作斗争的工人，为高尔基的“归队”而写信给他时，这样说道：“当大家都在紧张战斗的时候，我们队伍里看不到您，心里可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啊！……啊，我们在一起经历过多少战斗，经受过多少折磨。这下好啦，最重要的是您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您是我们的人了，这回您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永远在一起了！”这是全体俄国人民的心愿，高尔基把它化作了空前的工作热忱。他挑起了在一片废墟上建筑苏维埃文化大厦的领导重担。

在一九一八年底，高尔基回到苏维埃政权这一边的最初日子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表，多次出席了国际会议。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来临后，高尔基的文化创建工作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艰苦的国内战争使得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丧失了起码的条件。高尔基所要从事的恢复高等院校、团结知识分子、保护国家文物、出版普及读物、开展科研活动等全部工作，离开列宁的亲自过问便都寸步难行。高尔基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给列宁找的麻烦太多了。诸如水力采掘泥炭法啦、残疾儿童啦，高射炮校啦，等等。”列宁当然未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高尔基个人的私事。列宁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要求道：“同志们！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管何时何地，高尔基同志如果用此类问题要求你们支援，你们要千方百计予以协助，如果有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或者反对意见，要及时将事情原委报告给我。”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高尔基保护了萨波日尼科夫、费多罗夫等一大批科学家，组织了“改善学者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创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苏联第一份大型杂志《红色处女地》，创建了苏维埃自己的第一所工农大学，建立了彼得堡大戏院，保护了爱尔米达日等博物馆，出版了青年作家的革命著作和大批通俗文化读本。他的这些具有奠基性质的开创性工作，永远载入了苏维埃文化艺术发展的光辉史册。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期间，由于列宁当时住在莫斯科养伤，而高尔基又整天奔忙，他在思想上未能经常保持与革命导师的联系。面对国内外敌人造成的重重困难，高尔基对革命热情有余，信心不足的思想毛病又有所抬头。一些心怀叵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他忙于编务而不能深入生活的局限，重新以谣言和怨言包围了他。列宁多次去信，力劝他走出彼得堡，“彻底改换环境”，“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列宁还将自己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赠给高尔基。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好转，高尔基很快便结束了他在政治生活中这最后一次动摇。

在这百废俱兴的草创时期，高尔基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他配合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写出了苏维埃戏剧史上的第一部讽刺作品《说大话能手》。他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大批政论文章，向全世界集中抒发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怀。这期间写出的《回忆列夫·托尔斯泰》，是高尔基回忆录文学中的精品。它连同高尔基在革命前后写出的关于卡罗宁、柯罗连柯、柯丘宾斯基、加林-米哈伊洛夫、叶赛宁、契诃夫、勃洛克等人的回忆录里，刻画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借助于高尔基的传神之笔，他们至今还“活”在俄罗斯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由于彼得堡在战时的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加之繁重而紧张的工作，高尔基的肺病再次恶化。在列宁的恳切要求下，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离开彼得堡去国外。先是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疗养院治疗了两年半，在一九二四年春，移居到意大利的索伦多岛上。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度过了他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结性时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与世长辞。高尔基在国外，在病中承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怎能忘记与列宁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他怎能忘记列宁对他的哺育之恩与手足之情。他怎能忘记正是列宁建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高尔基列入在国外享受苏维埃国家公费医疗人员的名单；又怎能忘记，在列宁敦促他出国就医的信上，写着这样的话：“……我疲倦极了，以致于不能有何办法挽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您在咯血，却还不肯走！！”他含着热泪奋笔疾书，在同年五月份便写出了回忆自己导师与挚友的特写《列宁》。以后，他怀着对列宁的满腔热爱，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几易其稿，认真而又出色地完成了用文字为后人保存这一伟大形象的光荣任务。

列宁与高尔基长达二十年的革命交往，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史册里，是极其宝贵的一页。列宁作为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全面指导及全力支持，谱写了无产阶级科学地处理政治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典范篇章。高尔基一直是从政治家列宁那里获得方向，摆脱思想迷误；同时，又从他朋友列宁那里，不断地汲取生活的力量，开辟创作的源泉。高尔基正是从这两点最深刻的实际感受出发，在《列宁》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列宁形象。作为人，列宁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他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和他那童心未泯的广泛生活旨趣，使读者为这种巨大的个性魅力所倾倒，从而永远希望自己能去效仿列宁，像列宁那样生活；作为政治家，列宁那洞察历史的思想、坚忍不拔的精神、卓绝的工作才能、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每一个革命者都能从这里获得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动力。高尔基不仅再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俄罗斯人，而且塑造出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衷心敬仰的导师。

整个二十年代，苏联人民在胜利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激情空前高涨。高尔基虽然这时生活在国外，却始终通过密切的联系，感受着这种民族精神的昂扬勃发。他的创作热情也随之空前旺盛。他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部头作品。看到这一批长篇的书名：《我的大学》（1923）、《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前两部），我们很难相信这些都是一个正在养病的人之所为。但事实是，高尔基在自己文学创作的全盛时期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不仅在概括历史的广度上大大加强，而且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列宁在生前读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学》。它使列宁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了自己的“喀山大学时期”。正是在那几年里，列宁也到过喀山。高尔基将自己那个时代的战斗生活，写给正在创造新俄国的苏维埃时代的青年。书中阿列克塞追求真理，憎恶邪恶的精神，有力地鼓舞着苏联青年高举列宁的旗帜前进。

还在一九一一年，列宁第二次来到喀普里岛时，高尔基向他谈到了一部小说的构思。他说想写一个家庭从农奴到资本家的百年史。列宁肯定说：“主

题非常好，”但他又说：“我看不出：你将如何结尾？现实生活还不能提供一个应有的结局。没有。这应当在革命以后去写”。一九二五年，这部小说以《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为名出版了。十月革命提供了高尔基寻找“结局”的可能；高尔基也很快便实现了列宁的遗愿。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在几十年观察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工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人的实践，历史地概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兴衰过程。

小说从一八六三年农奴制改革后不久，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来到德略莫夫城开办工厂写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为止。

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是这一家第一代的代表，是这一家的家长和“事业”的创始人。他一方面生气勃勃，富于创业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资本家发家的血腥本质，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特点。

老伊里亚的长子彼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法制思想的资本家，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与落后性。这一家的第三代，彼得的小儿子亚科甫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堕落。

这一家的第二代，老伊里亚的外甥，过房的儿子阿历克塞，和他的儿子米隆都是资产阶级的活跃人物。但是他们也未能挽救这一家的没落与衰亡。只有彼得的大儿子小伊里亚，背叛了本阶级参加了革命，找到了新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五月，高尔基决定回国。这一次，并没有列宁或党的直接呼唤，但却有着一种使他难以克制的向往祖国的冲动。他取消了不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不回国的原定计划。祖国和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高尔基的归来。

从进入国境的第一站涅戈列洛起，高尔基可以说是在由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与热情洋溢的人群“铺成”的“铁路”上抵达莫斯科的。高尔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民给予他的莫大荣誉中，领会到了自己文学工作的崇高价值。他从扑面而来的感人气氛中，看到了祖国人民的崭新风貌。他含着热泪对欢迎的人们说：“我觉得，我离开俄罗斯不是六年，而是至少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祖国变得年轻了。我的印象是：在旧事物之中，在旧事物的包围之中，新事物，朝气蓬勃的新事物正在成长……我看到祖国年轻了。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变得年轻了。”正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这种崭新而又坚定的信念，高尔基在回国第三天，便提出了创办《我们的成就》一大型杂志的倡议。他要在革命胜利的旗帜下，开始讴歌新俄罗斯的新生活了。

高尔基从未像这时这样紧密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尽管在索伦多时，国内寄给他的大量邮件几乎形成了欧洲一条用户专用线，但他始终为不能亲眼见到火热的生活而懊恼。现在，他真正投身到这蓬勃向前的时代洪流中了。整个春天，他走遍莫斯科进行参观。他更乐于独自来到街头，与路遇的任何人随便交谈。但这必须先把自己化装一番后才可进行。著名作家费定回忆过这样一件事。他陪同高尔基去国家出版社。因为事先未想到要化装，高尔基只把自己的帽沿拉得低一点。但他的个子要比身边人高出半头，结果在出版社门口一下车，便被路上的行人认出来了。只听一声高叫：“高尔基！”人们立刻将他们俩围住了。群众向高尔基表示敬意，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递给他纸笔让他签名。高尔基被挤得一动不能动，只得大声说：“尊敬的公民们，你们这样做只能坏事，我绝对听不明白你们说的话。”还是出版社里的工作

人员闻讯赶来，才将他们“救”了出来。

这一年夏天，高尔基怀着被莫斯科人的新生活所鼓动得更炽烈的欲望，开始了他一生在俄罗斯的第三次旅行。然而，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流浪汉”的身分，也不仅是以一个誉满全球的作家的身分，而是作为“新时代与旧时代决战的见证人”身分去对祖国的历史性变化进行了解和介绍的。他在一年之内，游历了南方与北方，从高加索山脉到乌拉尔山脉，从黑海到白海，从第聂伯河到伏尔加河，从北极圈里的穆尔曼斯克到他的故乡下新城，行程不下二万俄里。他访问了工厂与集体农庄，矿山与水库建设工地，油田与牧场，学校与部队，劳改营与工学团。来到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喀山，高尔基要求青年们不应忘记父辈们的艰辛与十月革命对民族新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面对无比热情地迎送他的劳动群众，高尔基赞颂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勉励人民为祖国建设忘我地工作。会见各地的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他始终强调文学要反映新人，新生活，教育要为培养造就接班人服务。火热的时代，焕发了青春的人民，沸腾的生活，使高尔基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坚信共产党领导方面，上了生动有力的一课。他在下新城的“红色索尔莫沃”工厂群众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话，是绝非偶然的。他说：“我指的是共产党。我不是党内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但凭我的良心，我不能不对你们说，这——的确确是你们的大脑，你们的力量，确实实是你们领导者。”诚然，高尔基后来在形式上一直留在党外。但这仅仅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作，会更有利于争取一切文化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团结向前。在高尔基政治生涯的这一最后阶段，他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努力贯彻党的路线，为开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建立了不朽业绩。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符合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

这次漫游全国的丰富感性材料，形成了高尔基的一组特写《在苏联各地》。它成了苏联第一次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见证者。回到莫斯科后，高尔基从扫盲工作到安置流浪儿童，从成立出版社到创办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每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凡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给予大力协助。在这些活动当中，高尔基始终关注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与壮大苏联的作家队伍。在他的倡议下，先后组织了“工厂史”、“内战史”、“农村史”等出版社或编辑部，以工人阶级、革命战士和农庄社员撰写自己所在部门的光荣历史这种方式，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应当说，这是一项极有裨益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全国性事业。至于说到培养年轻一代的苏联作家，高尔基更是有“初学写作者的‘教父’”之称的。可以说，在二十一—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中，几乎找不出一个没有受过高尔基影响的作家。他以罕见的耐心和极大的热情，尽量亲自处理数量多得难以想象的来访、来信和来稿。他乐于从中发现天才的萌芽，也严格要求这些本能地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扶持的新苗，例如革拉特柯夫、肖洛霍夫、希什柯夫、巴赫麦季耶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符·伊凡诺夫、巴甫连柯、尼·吉洪诺夫、马卡连柯、伊萨柯夫斯基，以及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的许多苏联作家。还有许多未能达到他们这样成就的作家，以及根本就未成为作家，而只是因为一时幻想的冲动而要求高尔基予以指导、赞助的人，都从高尔基这里得到过关心与爱护。高尔基在几十年间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十分巨大的。他是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文学导师。

在对文学界提出表现新生活，表现新人物的新任务同时，高尔基深知旧

有的创作方法是不堪胜任的。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祖国人民最壮观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一个崭新现实。它使得高尔基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当探索出一种能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方法的可能性？而这种方法应当能用更鲜明的色彩刻画今天英雄的时代，用更高昂、更相称的格调来表现它。”高尔基并非只提倡两种旧有创作方法的简单结合。在强调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前提下，高尔基主张“多侧面的现实主义”，后由斯大林同志概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尔基从创作《母亲》时便开始了的这种探索实践，终于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从理论上得到了肯定性的总结，并被规定为指导苏联文学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原则。这是高尔基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又一奠基性贡献。

一九三二年四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议撤销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苏联文学界中削弱党的领导，破坏文学界团结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党委托高尔基须导这项改组工作，并筹备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组建内设党组的全苏作家协会。在此之前，高尔基曾多次呼吁国内作家能以党的事业为重，为人民的利益走到一起，共同繁荣苏联文学。担任了作协组织委员会主席以后，高尔基将这一工作放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去进行。他不仅在俄罗斯民族内致力于加强党内作家、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的团结，而且大大发展了俄罗斯民族与苏联其他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团结。他本人尽可能广泛地建立并保持同少数民族作家的联系。他建议国家出版社出版《苏联各民族作家文集》，安排俄罗斯作家到各兄弟加盟共和国去学习。在他的要求下，出版了迄今仍在发行的《各民族友谊》这一刊物。这一切，都使他赢得了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尊敬。他们称高尔基为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苏联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主持了这次标志着苏联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盛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在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无比信赖。还在一九三二年，全苏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时候，他的诞生地地下新城便被命名为高尔基城，以上演他的剧本而声名显赫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被命名为高尔基艺术剧院。到了这时，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学校和文化团体已遍布全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也大量出现在共和国的地图上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的小尼基特斯卡娅街的一幢房子里。这所建于一九二二年的“维也纳摩登式”洋房，由于高尔基在那里度过了晚年，而成为苏联当时领导文化事业的实际中心。那些年里，进出这所内外布满稀奇古怪的花纹雕饰的楼房的人，上至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市民。高尔基在这里接待过新生活的各类建设者，登门求教的各种拜访者。他在这里，会见过《母亲》中巴威尔形象的生活原型——来自高尔基城索尔莫沃工厂的老工人彼得·安得烈耶维奇·佐洛莫夫。而且只是由于十分偶然的原因，高尔基未能看到也来登门拜访他的革命前喀山一家面包店的老板——那个被写进中篇《老板》及《我的大学》中的“丑母鸡”谢苗诺夫。高尔基在家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斯大林正是出席在这里召开的筹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聚会时，讲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句名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具体范畴。高尔基上午在这里进行创作，下午会

见客人，晚间有时同家人与朋友们举办家庭音乐会、舞会和文学作品朗诵欣赏会。高尔基在他六十六岁那一年，为儿子过生日举行的家庭舞会上，“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方式长衫，戴着一顶绣花的小圆帽，样子显得非常漂亮，最低限度像童话里的神仙。”而来到这里的客人们始终恪守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即一律不在高尔基所在的房间里吸烟，尽管高尔基本人从未戒过烟。这是为了保护高尔基的健康，因为他有肺病。连斯大林呆在这里时，也都去楼内其他房间吸烟。

高尔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政论家。在萨马拉时期已磨砺得敏捷而锐利的文笔，在这一时期成了迅速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如椽大笔。在不到六年时间里他写出了三百多篇政论文章以及近千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接近于政论文的书信与演讲稿。表达深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赞颂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性劳动，揭露思想文化战线与经济建设上种种弊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抨击资产阶级“文明”，呼吁世界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些便是政论家高尔基恣意纵横的政论文的基本内容。而关于文学艺术的大量论文，是高尔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尤为宝贵的财富。在这些文章中，高尔基不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任务和方法，而且详尽回答了有关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文学与生活、与政治的外在联系等一切重大问题。高尔基在晚年利用这种形式总结了自己毕生的创作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宝库。

高尔基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后几年里，除了一直继续着《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外，还创作了三个剧本，改编了一个二十年前写的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间，国外反动势力操纵的间谍机关，在苏联中、上层知识分子中间（以工程师为主）网罗资产阶级残余，组成从事反革命暗杀破坏活动的地下组织“工业党”。高尔基及时写出了《索莫夫和别的人》这个剧本，它揭露了这场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

三十年代初，高尔基曾计划写出描写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覆亡与挣扎的剧作三部曲。尽管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他已经历史地再现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失败过程，但他一直还想用戏剧这种最恰当的形式再现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那些不平常的日日夜夜，以完成自己的夙愿。这剧作三部曲便是《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陀斯季加耶夫和别的人》以及《李亚宾宁和别的人》（未完成）。

第一个剧本从一九三一年夏开始写起，次年九月上演。最初高尔基曾将它命名为《前夜》。因为它描写的是二月革命的前夜。剧本在二月革命来临的背景上，塑造了外省的巨商布雷乔夫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形象。由店员爬到当地商业界头面人物的布雷乔夫，一生巧取豪夺、放荡不羁。帷幕拉开时，他已染上不治之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边是，象征着俄国资产阶级已经病入膏肓的主人公在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存在；而与此同时，来自同一阶级的律师、女修道院院长、资本家、地主、甚至他的妻子儿女，却围绕着他身后的遗产而当着他的面，提前展开了争夺的丑剧。目睹这严酷的社会现实，布雷乔夫责怪自己“住错了街”，对自己拼命跻身进来占了一席之地而资产阶级作了无情的揭露。面对无可救药的“疾病”，他慨叹必然规律的无情，为自己及其整个阶级被生活所淘汰而无限感伤。高尔基将他视为“忏悔的商人”。这个形象说明，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资产阶级从内部已

经开始崩溃。

然而，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像布雷乔夫这样听凭历史的安排。三部曲之二，描写了以陀斯季加耶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到十月间，对抗社会主义革命，而最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程。同布雷乔夫相比，陀斯季加耶夫这个人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更善于将这种清醒的头脑运用于改变自己阶级的厄运，同无产阶级进行更隐蔽的斗争。因此，他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最凶险的敌人。高尔基在设想的第三部中，曾交待说陀斯季加耶夫混过了在第二部结尾时他曾因预谋暴乱而对他进行的审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成了飞黄腾达的人物。但由于作家后来事务繁忙，未能写出三部曲之三。

剧中资产阶级的对立面革命者的形象，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逐渐占领三部曲的舞台的。在第一部中，共产党人尚处于地下。作者主要是以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在政治上的觉醒，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在第二部中，布雷乔夫的教子、布尔什维克克拉普捷夫，他的雇工顿纳特，革命的组织者李亚宾宁，以及剧本结尾时出现的大胡子士兵，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公开同资产阶级进行较量，最终战胜了他们。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部，剧本的名称已经是《李亚宾宁和别的人》了。按照高尔基的构思，舒拉“将会向左转，”格拉菲拉成了党的工作者，连第二部中出场的修道院的女仆塔伊西娅，也入了党。活动在社会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

高尔基平生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作品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同他大半生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度过的，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部作品描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十月革命这四十年间，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路上的分野，高尔基既有亲身经历，更有实际教训。所以，当这部酝酿了将近二十年的小说在一九二五年春开始动笔时，高尔基几易章节，几延篇幅，仿佛关于这个题目，他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名符其实的史诗规模的背景上刻画了萨姆金这个形象。从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知识界中小市民习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他们对斗争、对革命的恐惧，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领导欲的破产。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直在写这部小说，但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写完。然而萨姆金作为祖国与人民的敌人，已经得到了被游行队伍中的革命群众活活踩死的可耻下场。然而体现着高尔基的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斯捷潘·库图佐夫所走的道路，却没有作交待。但高尔基的一生，显示了知识分子同生活，同革命，同人民相结合的一切可能与灿烂的前景。

就高尔基一生创作的主题与题材来说，他显然是埋葬旧世界的一位文学巨人。还在十月革命前，他便预言了旧社会的必然灭亡。革命成功后，他又孜孜不倦地清扫着旧世界的废墟，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旧世界被毁灭的全过程。他同时又十分渴望自己成为新俄罗斯的赞颂者。他用特写这种精悍的文学形式，写下了新生活的赞美诗《在苏联各地》。他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表现新人的号召，还曾计划写一组《英雄的故事》。参加国内战争的英雄战士，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妇女与青年，这些记录在高尔基笔记中的普通人，都是“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物”。他们本应更多地出现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但却被万恶的病魔剥夺了这种权利。

从一九三三年起，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南部的泰斯里过冬，在莫斯科郊外的戈尔卡村避暑。而在一九三三年前，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要因肺病发作去索

伦多住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夏初，高尔基因克里米亚气候干热而返回莫斯科。但莫斯科这里同样是高温天气。六月一日，他在戈尔卡村患重感冒，从而引起肺病及心脏病的合并症。六月六日起，首都各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告。极为感人的是，《真理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专门印了一份不登这种公告的报纸供病中的高尔基阅读。苏联人民密切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各级组织与群众发出的慰问电函，带着衷心的祝愿，从祖国各地云集戈尔卡送到高尔基的病榻旁边。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次未能满足自己人民的心愿。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十分，与世长辞了。

六月二十日，在红场上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一天，苏联全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中母亲的原型，八十七岁高龄的高尔基城市民安娜·吉里洛芙娜·佐洛莫娃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在结束自己的悼念演讲时，她怀着无比深沉的母爱，高声呼叫着：“别了，阿辽沙！别了，儿子！”这时，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上空，回荡起这一诀别掀起的恸哭声浪。

从流浪汉到文学家，从十月革命的怀疑者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热情赞颂者，高尔基走过了充满艰辛曲折、但更是辉煌灿烂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人，他给我们留下了正直、坚韧、热情和勇敢的美德；作为一位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逾千万言的文学作品和不可估量的理论财富。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那凝神思考、睿智慈祥的导师形象，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引路帅旗。

主要作品介绍

自传体三部曲

《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通常被称为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

高尔基这三部自传体小说是在列宁的鼓励下写出来的，前后用了十年时间。这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虽有间隔，但读起来仍觉得是一气呵成，毫不松散，给人以亲切感，从中受益不浅。这三部曲是我们了解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早期生活的可靠的资料。

我们的小主人公阿列克塞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适逢其父病逝，但他年仅四岁，还不懂事，不知道丧父的悲痛。

聪明善良的外祖母把阿列克塞和他母亲接到尼日尼城外祖父家中。但母亲很快又离开了。这是一个弥漫着小市民习气的家庭。在冷酷的生活中外祖母成了阿列克塞最知心、最亲近的人。他外祖母年轻的时候，曾随残废的母亲流浪四方，靠织花边的手艺勉强糊口。浪迹四方时她搜集和传唱了很多优美动听的民间传说和诗歌。外祖母那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民间故事给小阿列克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刚到外祖父家不久，阿列克塞看到大人能把白布变成五颜六色的东西觉得很好玩，他在表哥的怂恿下把过节用的白桌布染成了黑色。结果喜怒无常的外祖父大动肝火，不顾外祖母的阻拦，把小阿列克塞狠狠打一顿。

一天夜里，突然染坊失火，火势凶猛，无法扑灭。这场大火把染坊化为灰烬。于是外祖父只好让两个儿子分家。

分家后，阿列克塞仍然跟外祖父、外祖母一起过。外祖父教他识字，外祖母讲童话和故事，读诗给他听。

不久，外祖父买了一所房子，在所有的房客中，阿列克塞最喜欢一个被称为化学家的人。此人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身上老带着化学试剂的气味。他落落寡欢，但对阿列克塞却非常和蔼。他要阿列克塞好好学写字，好把外祖母这些优美动人的故事记下来。阿列克塞则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向这位大朋友倾诉。可是好景不常，其他房客们和外祖父都认为这个勤勉的科学家搞“邪魔鬼道”，最后干脆把他撵走了。这事气得阿列克塞大叫：“你们全是混蛋！”这以后阿列克塞经常同车夫彼得伯伯一起玩。彼得伯伯常常给他讲起自己从前的主人——一个女地主残酷摧残农奴的故事。不料，一天彼得伯伯在花园里自刎而死。原来他时常干些偷窃教堂的勾当，案发后畏罪自杀。小阿列克塞就生活这样的环境中。

阿列克塞的母亲从远方又回到外祖父家中。她教阿列克塞背诗，学算术。阿列克塞很聪明，他很讨厌书本上那些不合口语的，枯燥无味的诗。这时他能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事情加上自己的想象，编成歌：

“ 在我们大门口，
无数孤儿和老头，
哀号乞讨，到处奔走，
讨来的都给了彼得罗芙娜，
她卖了钱好买牛，

在山沟里喝烧酒。”

在得知母亲准备再嫁时，阿列克塞非常反感，可是又有什么办法！母亲嫁给一个破落贵族子弟。这个纨绔子弟很不成器，转眼之间就在赌场中输尽了家产，成了穷光蛋。阿列克塞同他们一起过。看到继父喜新厌旧，百般虐待怀孕的母亲，心里十分气愤。

阿列克塞开始正式上学了。他穿的是母亲的皮鞋，而且没有《新约使徒传》这本神学课本，所以屡遭教师白眼。阿列克塞也想出一些恶作剧来加以报复。他学习很好，学校却打算开除他。幸好主教来学校视察，发现他聪慧过人，无所不知，露出赏识之意，这才保住了他的学籍。他念完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成绩优秀学校奖给他好几本书。

在念书期间，他又回到了外祖父家里。此时外祖父已经彻底破产了，他变成了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同外祖母分开过，就连茶叶也要一片片地平分。外祖母和阿列克塞只好自己养活自己。阿列克塞放学后就走遍大街小巷捡破烂。这种街头生活使他结识了一批天真、正直的穷苦孩子，他们行动一致，配合默契，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念完三年级之后，阿列克塞永远离开了学校，不久母亲又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个不幸的孤儿告别了饱尝善善恶恶的童年，走向苦难的人间。

为了不让十岁的阿列克塞吃闲饭，外祖父把他送到尼日尼城的“时式鞋店”里去当学徒。鞋店里的市侩习气使他不能忍受：店员对到店里来的女顾客当面肉麻地吹捧，背后则恶语相加。他非常怀念过去那种流浪街头的生活，时时想离开这个令人生厌的住处。不料后来他烫伤了手，竟因祸得福，住了几天医院，就回到外祖母那里去了。

外祖母虔信上帝，心肠慈善，她认为外祖父不肯周济穷人，得罪了上帝，才落到了彻底破产的地步。她带着阿列克塞趁着夜色，把自己干活挣来的钱和面包悄悄放在穷人的窗前。她告诉阿列克塞，在生活里大家应互相关心，上帝才会来帮助大家。

在夏天和初秋，阿列克塞和外祖母经常到森林里去采集青草、野果、蘑菇和核桃。用卖这些东西的钱来糊口和施舍穷人。有一次，阿列克塞看到树林里云杉挺拔，白桦苗条，鸟语婉转，觉得森林深处总带点梦幻的味道，激发人的想象。他想，要能够做个劫富济贫的强盗就好了，让众人都有吃有穿，快快活活。或者到外祖母心目中的善良的上帝或圣母面前去，把苦难生活的真相告诉他们。让上帝和圣母赐予他智慧，好换个方式来安排生活。在这颗幼稚的心灵中已经萌发了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的宏大理想。生活是很艰难的，可是艰难的生活也促使了阿列克塞的早熟。

深秋时节到来了。外祖父把他这个“无业游民”送到当绘图师的亲戚家里去当学徒。离开了使人心旷神怡的大自然，来到这个忙碌的地方听人役使，使阿列克塞倍觉不快。在这里他名为学徒，实为仆人，劈柴、烧水、擦地、买菜整天忙个不停。绘图师的恶狠狠的母亲一大早就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直到深夜才让他休息。这一家子是典型的小市民，说三道四，饕餮成性，动辄争吵不休。

后来阿列克塞终于受不了了，他告诉绘图师，他不是来打杂的，他要学手艺。绘图师并不生气，给了他纸笔、三角板和尺子，让他临摹图纸。他的第一张临摹是失败的：绘图师并不生气，耐心教他怎么画。后来阿列克塞画

出了一张近似原图的图纸。可是绘图师的母亲却担心这孩子将来会夺她儿子的饭碗，老是跟他捣乱，不是在图纸上泼煤油，就是让他不停地干活，甚至动手打他。于是他学手艺的事就不了了之了。阿列克塞只有在进教堂祷告的时候，才得到一点安慰。他把痛苦的生活编成有韵的“祷告词”念了出来：

“学手艺也没有学出什么结果，
魔鬼的傀儡玛特辽娜老太婆，
像狼那样嗅着要咬我。
这也太苦了，我实在没法活。”

不平则鸣，他就用这种形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显然在外祖母的口头诗歌的影响下，他已经能够用诗歌这种形式来表达感情了。

春天，他从绘图师那儿逃走了，在伏尔加河上的“善良号”轮船上当了洗碗工。他非常幸运，碰上了一个叫斯穆雷依的厨师。他看来很凶狠，其实是故意装出来的，他后来告诉阿列克塞说：要是人家知道你是好心人，就会把你折磨死。但他常常教育阿列克塞要做好人。这只船上有些工人很堕落，时常干些风流勾当，他们也裹胁阿列克塞干坏事。斯穆雷依挺身保护阿列克塞。这一老一少结下了莫逆之交。

斯穆雷依收藏了一箱子书。他每天都叫阿列克塞念书给他听，为了听书他甚至叫别的洗碗工替阿列克塞干活。有一次阿列克塞读果戈里的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他听得很入神，时而哑然失笑，时而涕泪滂沱，他说读这样的好书就像过节一样。他叫阿列克塞要好好学习，读不懂就多读几遍，一遍不懂就读七遍，七遍不懂就读它十二遍。就这样阿列克塞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籍启迪人的智慧，生活则更加耐人深思。“善良号”轮船拖的驳船上挤满了被称为“强盗”的被流放的政治犯。阿列克塞却觉得他们和常人完全一样。而轮船上有钱的乘客却是残酷无情、趣味低下的劣等人。后来因为有人陷害，阿列克塞只好离开轮船。临别时，斯穆雷依告诫他：要提防人，要读书。阿列克塞忍泪与之相别。

回到外祖母那里，阿列克塞一度以捕鸟为生。冬天到来，外祖父把他送回到绘图师那里。由于年龄已长，阅历增加和书籍的启发，他对那里无聊的生活更加敏感了。这时他渴望知识的欲望极强，读书热情非常高，无数新奇的书给他的生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绘图师家的人不准他多费灯油，他就借着月光或神龛上微弱的灯光读书。他从不同的地方借书，或者租书看。后来他从一个美丽富有的寡妇那里借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书。普希金的诗把他的心灵带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美丽的地方；屠格涅夫的小说和十二月党人的诗歌一扫现实生活的阴霾，使他对未来的生活燃起了希望；巴尔扎克笔下爱财如命的老葛朗台则使他想起了外祖父。

阿列克塞觉得借书给他的那位寡妇是位端庄圣洁的妇女，他暗中叫她“玛尔果皇后”。而她对阿列克塞的聪明好学很惊奇，很喜欢他，甚至想劝说绘图师送他去上学。然而院子里的人却用流言蜚语来诽谤这位寡妇，有人还诬赖他偷钱，这使阿列克塞益发憎恨这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这以后阿列克塞又到伏尔加河上的另一条船上做工。深秋天气，轮船航行结束了，阿列克塞就到一家圣像作坊去做学徒。白天女主人叫他到店铺里去。店员教他一些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花招。在这里他看到了商人的种种

无耻勾当。

只有到夜里他才能到圣像作坊里去学手艺。在作坊里每个工人只能完成一道简单机械的工序。阿列克塞渐渐对这种不能发挥创造性的手艺也失掉了兴趣。

作坊里的工人心地善良，但长年关在低矮的作坊里，眼界非常狭窄。阿列克塞向他们讲起了自己在船上的经历，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在这里阿列克塞又成了小说的朗读者。一次他给大家朗诵莱蒙托夫的作品，是描写一个天使反抗上天的统治者的长篇叙事诗《恶魔》，他自己激动得热泪盈眶，工人们一个个都放下手里的活，凝神谛听。第二天大家让他再朗诵一遍，他们说：“这才叫生活”。有一个工人还把整首诗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工作无聊，生活苦闷，阿列克塞就同师兄们一起演剧来给大家解闷。在他命名日那天，作坊里的人送给他一个画得很美的圣徒像。席哈列夫对他说：“我称赞你，因为你面对面的正视一切。要永远这样才对！”这使阿列克塞终生难忘。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列克塞观察分析生活的能力也提高了。他看到作坊里的工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糟透了，可是没有人愿以举手投足之劳来改变现状，大家照旧浑浑噩噩地活着，而且逐渐在堕落。他盼望着离开这个沉闷的作坊，到伏尔加河上去，到波斯去。

后来阿列克塞听从从前的主人绘图师的劝告，又一次回到了他那里。现在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些中学生和漂亮的小姐，他们借书给阿列克塞看，同他讨论文学。尽管他比他们岁数更小，但他阅历丰富，读的书很多，颇有优越感。那些小伙子也常常谈起姑娘，时而爱这个，时而爱那个，还要附庸风雅，寄情赋诗，无奈手段不济，常常要请阿列克塞捉刀代笔。

后来绘图师派阿列克塞到施工工地去当监工。这个工作却使他结识了很多从农村来的工人。阿列克塞发现这些庄稼汉出身的工人比他过去所见到的小市民要有趣得多。他们亦好亦坏，各具特色，完全不同于书上所描写的那种干巴巴的农民形象。尽管身为监工，但阿列克塞同他们很快就和平共处了。老工人奥西普长得堂堂正正，他经常教给阿列克塞一些为人之道。阿列克塞津津有味地读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给工人们听，可是他们都不感兴趣。

阿列克塞也曾在旧社会的罪恶的渊藪中长了见识。工地上有个叫阿尔达里昂的出色的砌砖工，他突然抛下工作，到流浪汉聚居的地方去寻花问柳，成了闯荡江湖的流浪汉。奥西普跑去劝说他也无济于事。阿列克塞却同此人交上了朋友，每到假日，就到他那里去观察这些好汉。他发现这是些被生活抛弃的人，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敢作敢当；到了没有活干的时候，他们就到轮船上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他们的生活比一切都快活。奥西普发现阿列克塞去那种地方之后，警告他不要跟那班人打得火热。阿列克塞却说他喜欢这些人，他们不做工，生活快活。奥西普勃然大怒，说：“这是傻瓜和懒汉的话”。可是后来阿列克塞却自动同那种人断绝了交往。一次他在这条街上碰到了娜达丽雅，她过去是绘图师院子里的洗衣女工，因为女儿无情地抛弃了她而沦落到烟花巷中。在这里见到阿列克塞，她很吃惊，再三恳求阿列克塞离开这个让人“完蛋”的地方。他们刚一分手，阿列克塞没走多远，就碰到阿尔达里昂毒打她。他把阿尔达里昂撞倒在地，保护了娜达丽雅。此后他再也没有到那个地方去了。阿列克塞喜欢流浪汉是因为他们比庸俗、猥琐和逆来顺受的小市民显得高尚一些，但这些人对妇女的凌辱和其他恶习又使他不能容忍。

到了冬天无法施工的时候，他又回到绘图师家里，白天有干不完的杂活，夜里自己读书，试写诗歌。每到假日的傍晚，他就到一家小饭铺去听唱歌。店堂里寂静得像教堂一样，歌手就是善良的司祭，在忧郁的歌声中，他真诚地在为人类祈祷。人们只有在这里才过着真实的生活。

阿列克塞没有堕落，他不喝酒，不同女人鬼混。但他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上有时感到茫然。有时他想远离可怕的尘世，寄身山野，有时又受到书的启迪，要效仿法国小说中的英雄，拔剑而起，死守岗位。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有所作为才成，要不然我就完了”。

在愁云密布的秋天，阿列克塞不止一次在森林里迷了路，他咬紧牙关，索性照直穿过密林，踩着枯枝朽木，涉沼泽，越山岗，最后还是走上了大路。

从这里他获得了人生的启迪。他决定离开尼日尼，到喀山去。

这就是阿列克塞在人间寻找生活道路的经历。阿列克塞在社会生活中反抗丑恶现实的斗争精神不断增长，他的正直而善良的秉性、深刻的洞察和分析能力以及书本对他的启发使他很快成长起来。

十五岁的阿列克塞来到喀山。他希望进大学学习。当然这只是幻想。后来为了生活他又去做工了。

社会就是大学，在阿列克塞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大学中，伏尔加河是他最亲近的母校。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工人和流浪汉，学到了无数生活中的经验。他来到伏尔加河的码头上，成了流浪汉大军中的一员。虽然他进大学的希望已成泡影，但他不曾自暴自弃，他所读的书给他开辟了光明的世界，他在外祖母讲的童话中窥视到了美好王国，他对未来那种朦胧的希望使他决不自甘堕落。一个曾经是师范学院学生的小偷怂恿他也去当梁上君子，他坚决拒绝了。他对流浪汉保持着冷静的审视态度。

阿列克塞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一个叫古里·普列特涅夫的学生请阿列克塞到他那儿去住。古里同革命者有密切联系。有一次，这条街的警长尼基弗雷奇从他们这幢楼里抓走了组织地下印刷厂的人，古里叫阿列克塞去报信。阿列克塞机警地躲过了监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个铜匠。阿列克塞因为第一次完成了秘密工作任务，心中暗自得意。他还主动要求古里介绍他参加进步的地下组织。

后来经人介绍，阿列克塞认识了杂货店老板安德列·捷林柯夫。他的秘密贮藏室里有一个“地下”图书室，收藏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民粹派的许多著作。喀山的许多大学生和有革命要求的人都来这里借书读。

在大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捷林柯夫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倾向革命的青年们聚会的场所，他还把做生意所得的钱全部用来资助革命活动。阿列克塞看到忧国忧民的大学生常常到这里来抨击当局，批评国事，探求改变生活的现状，他们都希望在书中找到自己观点的论据。这是些民粹派青年，他们对人民的崇敬仅仅限于口头上。他们对阿列克塞摆出导师的架势，而对他的见解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冷嘲热讽。但是阿列克塞还是被他们忧国忧民的热情和改变现实的意图所深深地打动了。

秋天来了，阿列克塞没有固定的工作就无法生活，于是他就进了一家面包作坊。同大学生们断绝了往来，不能到捷林柯夫的铺子里去，他就像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一样。在这个地窖里人们像蛆虫一样蠕动着，靠酗酒打闹，寻花问柳来忘掉现实生活。在这里阿列克塞感到精神非常痛苦。

为了给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物质帮助，捷林柯夫开了一家面包店。阿列克塞离开了那个面包作坊来到这里，既当面包师的助手，又当他的监视者，不让他偷走面粉、鸡蛋和牛油。阿列克塞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之久，他有时还到大学里去一面卖面包，一面听大学生们争论问题，同时也暗中替大学生们传递书籍和便条。尽管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在工作的空隙和休息时间看书。他很喜欢读诗，也用“自己的话”来写诗。

警察注意到了这个铺子，他向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谈到了杂货铺的危险，以后大学生们就决定尽量少到这儿聚会。

有天晚上，阿列克塞到郊外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去听人读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这是普列汉诺夫在同民意党断绝关系后，批判民粹派的文章《我们的意见分歧》。刚听念了几句，那些民粹派的听众就勃然大怒，乱喊乱叫起来。就在这天晚上阿列克塞认识了费多尔塞也夫——俄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费多尔塞也夫知道了他们的面包铺，但他总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无意义的事，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阿列克塞从事更有意义的革命工作。阿列克塞也深有同感。他们当时约定了再见面的方法，可惜竟未能如愿。

阿列克塞同工厂的工人也有一些联系，其中他要好的有两个工人，一个是织布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老头儿，他认为生活糟透了，但是问题不在沙皇那里，而在老板身上，指望沙皇来管束一下老板；另一个是钳工雅可夫·沙波什尼柯夫，他对宗教怀着强烈的憎恨，他说《圣经》全是捏造出来的，上帝粮本不存在，它也是人们捏造的。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无产阶级的朦胧的、不满情绪。可是阿列克塞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五俄里，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

阿列克塞觉得自己很喜欢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也很喜欢另一个女店员。他觉得自己在恋爱了。其实他所需要的是女人的温情和推心置腹地谈心。他在大学生中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觉得非常孤独。在当时，他既未能同费多尔塞也夫这样的革命家建立联系，同有觉悟的工人也缺乏交往，所以精神很痛苦。

这一年的十二月，阿列克塞决心要自杀。他从市场上买来了一支旧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打了一枪。他本想打中心脏，可是只打穿了一叶肺。过了一个月他渐渐恢复了元气，他惭愧万分，觉得自己蠢极了，于是又回到面包房干活。

这桩事发生之后，早就留心阿列克塞的一个叫罗马斯的革命者请他到乡下去帮助自己开展工作。阿列克塞很高兴，两天后就跟他搭船到红景村去了。

罗马斯是铁匠的儿子，后来当上了铁路工人，因参加革命工作，在雅库茨克度过了一段艰苦、漫长的流放生活。现在他在红景村开了个店铺，为革命筹款，同时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以前虽然未同阿列克塞交谈过，但他发现阿列克塞参加小组并不是为了斗嘴，说空话，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干点工作。他正需要这样的助手，于是就请阿列克塞到自己那儿去。

到红景村的第一夜，罗马斯同阿列克塞开怀畅谈。罗马斯谈起了自己坎坷的经历，他认为阿列克塞颇有才能，意志顽强，应该既从书本中、又从生活中学习。阿列克塞第一次感到了真诚的友谊，消除了自杀事件后的自卑感。罗马斯使他重新挺起了胸膛。

红景村风景秀丽，异常寂静。罗马斯有很多有价值的书，阿列克塞一一悉心阅读，收获很大。他还经常教信任罗马斯的小伙子伊佐特认字，而伊佐

特则告诉他不少农村里的事。

罗马斯的小铺里的东西比另外两家便宜，这使那些商贩很眼红。同时罗马斯希望唤起农民的觉醒，他要组织力量来反对警察滥施淫威，反对富农的统治，乃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他从细小的工作做起：组织了一个果农合作社，让农民组织起来一块到城里去推销苹果，不受水果商人的剥削。因此，罗马斯和阿列克塞就成了村长和富农们的眼中钉。他们经常采用阴谋手段来对付罗马斯等人。罗马斯遇到了两次枪击，幸好他很机警，所以才安然脱险。一天夜里阿列克塞被棍子打伤了腿，腿瘸了好几天。年轻漂亮的伊佐特，因为拥护罗马斯，在打鱼时被人劈死了。罗马斯和阿列克塞并未被吓倒，他们继续开展工作。

这年秋天，罗马斯准备同捷林柯夫的妹妹玛丽亚结婚。可是，一天早上小铺被人放了一把火，一刹那大火冲天，无法扑灭。阿列克塞奋力抢救，又是拖煤油桶，又是抢书箱，受了伤昏迷了过去。一清醒过来，他又奔忙起来，这既是出于他的勇敢，也是由于他想报答罗马斯对他的恩情。罗马斯镇定自若地指挥农民救火。可是火势太猛，已经无法扑灭，最后小铺和所有的货物连同附近的农舍全都化为灰烬了。

罗马斯只好离开红景村。阿列克塞也就这样结束了乡间的生活。他同红景村的一个农民一起到了黑海边，在一个渔业合作社做工。阿列克塞开始了漫游俄罗斯的新历程。

在喀山和农村这些社会大学里，阿列克塞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和革命的实践，思想逐渐提高，由自发地进行个人反抗发展到了自觉地参加革命，这就是阿列克塞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

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是高尔基的主要作品之一。作家对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而深刻的概括，他对旧世界的强烈的憎恨和有利的抨击、对主人公探求革命真理的历程的描绘，都说明三部曲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

这三部曲是成功的传记作品，它既鲜明地展示了作为主人公的作家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期所留下的足迹，又形象地反映出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政治面貌，同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首先，在作品中社会历史生活是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背景和条件，而主人公又必然要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从生活中的某一个角度来反映时代。作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把主人公和他的思想同社会联系了起来。在外祖父迁进新居之后，通过彼得伯伯的讲述，阿列克塞知道了贵族地主对农奴的残酷的、非人的压迫。这使他对俄国社会特有的农奴制和农奴制的残余，有了初步认识。在《我的大学》中主人公或者从人们滔滔不绝的争论、讲演中了解到进步青年的思想情绪，或者直接参加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的工作，认识到俄国农民不是民主革命中的最进步、最可靠的阶级。其次，高尔基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在反映社会环境对主人公的影响的同时，又反映了主人公是在不断地反抗社会现实中成长起来的。现实生活使他坚信，人是在不断反抗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的确如此，在善良的外祖母、厨师斯穆雷依、洗衣女工娜达丽雅等人的帮助和教育下，主人公形成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不同它妥协的坚强性格。在第三部中，他由个人自发的反抗走上了寻求真理、走集体反抗、推翻黑暗社会的道路，成了与黑暗现实进行斗争的战士。

高尔基的这三部曲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三部曲刻画了许许多多性格鲜明、不乏光彩的人物形象。高尔基不是以几条抽象的、具有道德色彩的

概括来肢解人物，把人物变成某种概念的化身，而是真实地反映人物的若干侧面。这既像是复杂的生活给年轻的主人公出的考题，也像是让读者自己对人物加以分析评论。

富有政论性的议论是三部曲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在作品的叙述和描写中，作家不时地插入富有政论性的议论，赋予作品强烈的传记色彩。作品叙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一个小孩或青年眼目所及的东西，但作家并不囿于当时主人公的思想水平，正是在议论中作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当时的人物，或赞美，或抨击，或阐发人生哲理，时时闪耀出思想的火花。《在人间》中主人公曾一度对遭受迫害的虔信宗教的老人们满怀敬仰之情，认为他们具有为追求真理不怕承担磨难的精神。作家在议论中指出：后来他认识到这些人并不那么崇高，他们不过是受怀旧情绪的支配，对苦难和压迫有一种病态的爱好，他们是俄国落后的群众，同先进人物的精神是相悖的。以这样的犀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剖析作品中的人和事，使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同普通的自传体作品有很大区别。

《母 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第一次塑造了血肉丰满的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艺术珍品。《母亲》的问世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已完全成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俄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〇六年夏天，高尔基在美国开始创作这部新时代的作品。同年十二月，《母亲》的英译本在美国杂志上逐章发表，翌年出了单行本。《母亲》的俄文单行本于一九〇七年在柏林出版，而同年在俄国出版的《母亲》不过是被沙皇政府当局大加删节后的残本。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两年间，《母亲》被译成法、意、德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一九三七年译成中文在中国秘密流传。

小说是从描写旧时代的生活开始的。

每天早上，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沉，疲惫不堪的工人听见这吼叫声，就像受惊的蟑螂一样，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一回到家里，工人们不是同妻子吵闹，就是对她们大打出手。年轻人则更为放荡不羁，他们下酒馆，玩乐器，听淫荡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甚至疯狂起来像野兽一样厮打不休，打得头破血流，乃至一命呜呼。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要死去。

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的父亲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与众稍有不同的是他以打人而名扬一时。在巴威尔十四岁那年，他想揪住巴威尔的头发痛打一顿。谁知巴威尔操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短干脆地说：“不许动手！”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管儿子的事了，也不和儿子说话。后来他患疝气病死了。这个备受痛苦生活磨难，而又看不到给他造成痛苦的社会原因的工人，对现实怀着盲目的仇恨，死去之后脸上仍留着怒气冲冲的表情。他的命运在旧时代的工人中是很典型的。

他死了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他死了，他老婆可以松口气了。是的，这个叫尼洛夫娜·符拉索娃的女主人公，被长年的操劳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身体，有点驼背，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身子，好像生怕撞上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脸上满是皱纹，有些浮肿，暗淡的眼神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这个柔弱、忧郁和温顺的妇女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

父亲死的时候，巴威尔只有十六岁。年轻小伙子需要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买了手风琴、胸部浆得很硬的衬衫、颜色鲜艳的领带、鞋和手杖，他变得和他年纪相仿佛的青年一样，经常去参加晚会，学会了跳舞。每逢假日，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总是非常难受，早上就感到头痛，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母亲问他：“怎么样？你昨天过得痛快吗？”他带着抑郁焦躁的口吻回答道：“闷得要死！”

这些受尽煎熬，而苦于没有正确出路的人们，极待觉醒，亟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这种觉醒，他们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沉沦。这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小说就是描写这种结合的过程。

日复一日地活着，母亲发现儿子变了。他干活很卖劲，从不旷工。他同世代代工人所走的老路告别了，很少参加晚会，节假日也不在外边喝酒。他经常带书回家，悄悄地用心阅读，读完了就藏起来，有时从小册子上抄点什么。抄完了就把本子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有一天巴威尔带了一张耶稣复活的画回家，把它贴在墙上。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却对儿子的行为大惑不解：“信基督，可又不去教堂。”当时她当然不明白，对耶稣复活巴威尔是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接受革命思想，走革命道路。看到儿子变好，母亲忧喜参半。就这样两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巴威尔对母亲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告诉母亲说，我在读讲我们工人生活真理的书，如果警察查出了这些书，就会被捕、坐牢。母亲很担心，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巴威尔说：“我渴望知道真理。”接着他用母亲自己的艰难困苦的生活来启发她，这深深触动了母亲的心，使她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感情。她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解释自己的生活和工人的生活而感到自豪。当她知道巴威尔不但要自己学习，还要去教育别人，让大家都觉醒的时候，她知道儿子已经献身于一种崇高的事业了，她不禁又要替儿子担忧：“呵，我的天！你变得真叫人担心哪！”巴威尔的话叩开了母亲的心扉，在她的心灵深处燃烧起了早已熄灭的对生活的不满，使她开始觉悟，最后终于走上了儿子所走的革命道路。

巴威尔的同志在他家第一次聚会之前，母亲不免提心吊胆，她以为要碰到一些可怕的人物。结果来的人当中有说话诙谐的“霍霍尔”，有和蔼可亲的娜达莎，有的人就是母亲认识的年轻工人，他们都给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念书、争论问题。母亲替他们烧茶倒水，忙个不停，对他们的争论也很有兴趣。有人认为只需要知道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就行了，不必学习历史。巴威尔和娜达莎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什么都要知道，要能看清一切，在自己的身上燃起理性的火光，用力量和智慧去战胜敌人。大家散了之后，母亲从巴威尔那儿知道：娜达莎是小学教员。她父亲是做钢铁生意的阔佬，父亲知道娜达莎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把她赶出了家门。母亲的心情十分复杂，她很可怜这个姑娘，同时她还担心儿子可能被捕，她不由得替他们祈祷：“上帝呵——发发慈悲吧！”

从此以后，巴威尔的同志常来这儿聚会。母亲给他们烧茶炊，热心地照顾他们。母亲还给衣着单薄的娜达莎织袜子。母亲称她是“我可怜的孩子。”娜达莎却说，要是您能了解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伟大，您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多么高兴。母亲当时对这个道理虽然还不太懂，离走上自觉革命的道路还有一段距离，然而在巴威尔的同志们唱的《国际歌》的歌声里，她预感到一种深远辽阔的境界，她被这悲壮有力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

霍霍尔叫她“妈妈”，而且经常来帮她干活，这使她满心欢喜。后来母亲主动叫霍霍尔搬到她家里来住。还有许多人经常从城里到她家里来，来的最勤的是见多识广的地方自治局职员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和举止步伐有些像男人的姑娘莎馨卡。

巴威尔和同志们的聚会引起了邻居的注意，有人劝母亲给巴威尔娶亲，好让他别惹是生非。母亲提起此事，巴威尔和霍霍尔却开玩笑地说，应该开导开导这些以为结婚、受压迫是好事的傻姑娘。母亲却认真地说，你们去找聪明一点的来开导吧。其实巴威尔对此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认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能成亲。母亲在无意中听到霍霍尔告诉巴威尔，他爱上了娜达

莎。巴威尔劝他要从长考虑，因为革命者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就只是为了面包、孩子，于是油盐柴米，家务缠身，事业就完了。霍霍尔听从了巴威尔的劝告。

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散发了很多手抄的传单，这些传单猛烈抨击了工厂制度，讲到了许多罢工事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于是很多暗探来到工人区，鬼鬼祟祟，到处乱窜。这些传单引起了工人的极大兴趣，他们津津有味地读着传单，谈论着社会主义者。

有一天一个女邻居告诉母亲，今天晚上警察要搜查你们家。母亲把所有的小册子收拾在一起，抱在胸前，东看看，西瞅瞅，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好。一直到巴威尔和霍霍尔从工厂回来，才把传单和小册子藏到了院子里，他们劝母亲不必惊慌。夜里无事，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警察真的光临了。母亲开始有些慌张，后来她克制住了内心的恐惧，连走路也不像平时那样侧着身子了，直起腰，挺起胸，神情异常严肃。警察乱翻了一气，除了《圣经》之类的书而外，他们毫无收获。他们却蛮不讲理地逮捕了霍霍尔和当时在巴威尔家的另一个工人。母亲上前去阻止他们，一个军官却对母亲咆哮起来。母亲很愤怒，她指着军官说：“您喊什么！……你们为什么抓人？”凶恶的军官对她却毫无办法。巴威尔镇静地同被捕的同志告别，对军官暗示他也快要被捕这件事毫不理睬。人去屋空，面对狼藉不堪的房间，母亲对儿子叹息道：“等着吧，他们也要把你抓去的！”巴威尔仍然不动声色。母亲觉得巴威尔的心肠太硬了。

这桩事发生之后，他们的邻居，农民出身的伙伕雷宾来到巴威尔家里，他警告巴威尔说，你们都暴露了，当局已经发现了你们的意图。后来他同巴威尔争论起了改造生活和上帝之类的问题。巴威尔认为，神父用上帝来吓唬人，他们用上帝的名义来迫使人民服从少数人的罪恶统治。雷宾却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可是有人却歪曲上帝的形象，用来扼杀我们的心灵。巴威尔相信理性和现实，雷宾却只相信心灵。尽管雷宾的观点很幼稚，他却觉得巴威尔太年轻，不了解人和社会。

母亲在一旁听他们的争论，这些尖锐激烈的不信上帝的话刺伤了母亲的心。但她又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不信上帝的背后，巴威尔自有一种信仰，这又使她感到安慰。

从此，雷宾成了巴威尔家的常客，在巴威尔和同志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革命的真理在这位农民的心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巴威尔的小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注意，他们常常跑来把警察和工厂当局干的不公正的事告诉巴威尔，巴威尔就向他们介绍法律知识和斗争方法，替他们找律师。工人们对这个严肃的年轻人越来越信赖了。特别是“沼地戈比”事件发生后，巴威尔的威望提高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工厂的周围有个腐臭的沼地，新厂主打算从中捞一把，排干沼地，采掘泥炭。他下令从工人工资里的每一个卢布扣除一个戈比，作为改造沼地的费用，可是职员们的工资却分文不扣。对这事工人们义愤填膺。他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愤慨地抨击这种做法。雷宾首先站了出去，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起来抗议决不是为了一个戈比，而是为了正义。我们看重的并非金钱，而是血汗、真理！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巴威尔到来的时候，大家让出一条路，让他站出来讲话。巴威尔满怀强烈的愿望，要把

燃烧着真理之火的心献给人们。他先说，财富是工人创造的，可是谁也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待。他的话马上吸引了大家，在他周围很快形成了黑压压的人海，母亲见了非常高兴。巴威尔接着号召大家：“我们彼此都是同志，为了我们的权利而共同斗争的愿望，促使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大家庭……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如果我们要想战胜敌人，就应该把这当作我们的准则！”

听了巴威尔的话，工人的斗争情绪更为高涨，大家推举他和雷宾以及另一个老工人为代表去同厂主交涉，要求他收回成命。

然而那时工人的觉悟程度还不够高，斗争的意志不够坚定。厂主来了，巴威尔代表工人提出了要求。可是这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威胁工人说，要是不立即上工就统统罚款。工人们问巴威尔怎么办。巴威尔提议全体罢工，可是响应的人并不多。

这使巴威尔很痛苦，他责怪自己不能很好地说明真理，所以不能把工人真正发动起来。但是他坚信，工人们今天不明白，明天总会明白的。“沼地戈比”斗争的失败说明，工人没有真正觉悟，斗争就不利，就会失败。

这天夜里，厂主收买了警察来抓巴威尔。当时母亲真想抱住儿子痛哭一场，但她感到站在旁边的军官巴不得她流泪哀求，就强忍悲痛，鼓起全身的力气，镇静地同儿子握手告别。同一天晚上雷宾的家也被抄了，还有几个同志被捕。

为了使儿子早日出狱，母亲主动要求接替巴威尔继续到工厂去散发小册子和传单，使敌人找不到理由治巴威尔的罪。传单继续出现，说明巴威尔并不是散发传单的人。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莎馨卡把印好的传单送了来。第二天母亲以卖饭的小商贩身份躲过了门卫的搜查，把传单顺利地送进工厂。在巴威尔和他的同志的影响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母亲终于投身到了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后来母亲听说，巴威尔和莎馨卡相爱了，可是他们总也不能在一起，莎馨卡刚从监狱出来，巴威尔又被抓了进去。即使在一起他们也不能结婚，因为巴威尔仍然坚持自己的信条，家庭是革命事业的累赘。母亲知道了这事感叹不已。

就在母亲送传单进工厂的这一天傍晚，霍霍尔被放回来了。母亲见到他悲喜交集。霍霍尔告诉她，巴威尔是个很坚强的人，他在狱中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母亲很自豪地把进工厂暗中散发传单的事告诉了他，还谈起了自己的巨大变化：以前她担心的是巴威尔，现在她替大家担心，她觉得革命者都是她的亲人。革命开阔了这位母亲的胸襟，使她从个人生活的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加入到革命者的大家庭中。

霍霍尔出狱之后开始教母亲识字，她老是记不住，有时竟急得偷偷地哭了起来。但她是一位很要强的女人，每天从工厂散发传单回来，就背着霍霍尔用功地学起来。

巴威尔终于出狱了。他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亲爱的妈妈！”母亲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轻声地说：“你怎么说这话！为什么谢我呢？”巴威尔不无自豪地说：“你为伟大的事业出了力，所以要谢你！一个人能够称呼自己的妈妈是志同道合的亲人——这是难得的幸福呵！”看到儿子归来。这是母亲平生最大的喜悦，她想把这喜悦永远珍藏在心里。这里既有母子之情，又有同志间的深刻的相互理解，此情此景非常动人。

春天来临，冰消雪融，几条小溪欢畅地流向沼地。在这大地复苏的时候，巴威尔和同志们在着手准备庆祝五一劳动节了。他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这一段时间莎馨卡常来巴威尔家。当她知道巴威尔决定游行的时候亲自举旗时，她要求他不要出头打旗。她劝巴威尔说，你威信高，大家爱戴你，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要因为打旗被流放他乡。巴威尔丝毫不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认为举红旗是自己的权利，他对她说，你是我亲爱的人，所以你不该说这样的话。母亲知道了这个决定也不好受，巴威尔叹息说：“到什么时候母亲才会欢欢喜喜地送自己的孩子慷慨就义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刺痛母亲的话：“有一种爱是妨碍人生活的……”霍霍尔听到了母子二人的对话，他批评巴威尔，让他不要惹母亲难受。这样巴威尔才意识到了自己对母亲的态度不好，向母亲表示道歉。母亲的胸怀是宽广的，伟大的信念使她振奋了起来：“你就去吧，跟在你后面还有别的人，他们抛弃了一切，跟上来了！”

这时雷宾来到了巴威尔家。“沼地戈比”事件之后，雷宾就离开了工厂，到乡下去当烧炭工去了。他带了巴威尔他们的传单去乡下，用这些传单和《圣经》作宣传。回到乡下，雷宾看到农民的生活糟透了，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当官的还要在他们身上捞一把。农民这种生活叫雷宾痛苦极了，他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认识。他来到这里是想让巴威尔给他一些“读了让人坐卧不安的书”，以使用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他还要求巴威尔给农民写点东西，“让农村也沸腾起来”，“让人民敢去拚死斗争”。雷宾的到来使巴威尔和霍霍尔觉得，农民就要起来斗争了，他们会烧光一切，以使自己屈辱的生活烟消云散。他们共同意识到，应该让农民信任觉悟的工人，跟着这些工人走，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

五一节到了。一大早母亲就跟着巴威尔他们去参加示威游行，有个工人见了她非常惊奇：“连你也要造反？”母亲自豪地回答说：“在我死以前，我还想跟真理一块走走呢！”

霍霍尔首先站出去演讲，他说他不信地球上的人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民族，只有两种势不两立的人——穷人和富人。巴威尔的演说则把群众的情绪推到了高潮。他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决定公开宣告我们是怎样的人，今天，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旗帜，举起理性、真理和自由的旗帜。”于是长长的旗竿在空中一闪，又倾斜下来，把人群分开，隐没在人丛里。顷刻间，一面工人阶级的大旗，像红色的鸟儿一样，突然飞杨在翘首企望的人们的上空。巴威尔松开一只手，把红旗高高地举了起来，这时十来只手抓住了旗竿，其中也有母亲的手。巴威尔高呼：“社会民主工党万岁！”“全世界的工人万岁！”成千人的齐声响应，发出了震撼心弦的呼声。

霍霍尔号召大家进行一次“神圣的进军”，“我们号召，凡是相信我们必胜的，就跟我们来；看不见我们的目标，就不要跟我们走，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苦难。排好队，同志们！”人群聚拢得更紧了。巴威尔把旗竿一挥，大旗迎风招展，在阳光照耀下，红旗鲜艳夺目。这时几十个人唱起了悲壮有力的《国际歌》，在伟大雄壮的歌声中，痛苦的遭遇，感情的重压，都融化得一干二净，对新事物的恐惧心理，也都烧成灰烬。游行队伍在歌声中前进着，壮大着。

这一天，惶恐不安的省长亲自出马，他在学校和工厂旁各派了一连兵力，随时准备镇压游行的群众。消息传出，有些人后退了。巴威尔不停地鼓动大家继续前进。游行队伍形成了楔子形状，巴威尔身处楔子的顶端，工人阶级

的红灿灿的大旗，就在他头上飘扬。

母亲落在后面了，她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队伍前端的动静。游行队伍的对面，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忽然传来了口令声：“挥枪！”“齐步走！”母亲大踏步奔到儿子面前。霍霍尔也一个箭步跨到巴威尔前面，用自己细长的身躯把他挡住。巴威尔却用肩膀碰一碰他：“并排走！你没有这种权利，大旗应当走在前面！”对面士兵的面孔已经可以看清楚了。又有人后退了。后来在旗帜下面只剩下二十来人，但他们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一个军官冲过来抓住旗竿。“滚开！”巴威尔一声怒吼。红旗摇晃了几下，又笔直地竖立了起来。几个士兵一起冲上去才夺走了红旗。母亲在后面猛喊了起来。回答她的是巴威尔清晰的声音：“再见了，妈妈！”霍霍尔也喊道：“再见了，我的妈妈！”

在他们被抓走之后，面对尚未散去的人们，母亲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宣传了革命道理：“这些孩子们，我们的亲骨肉，在世界上为真理而行动起来了。为了大家，为了你们的后代，他们为自己选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她一面说，一面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愿望：激励人们跟着被敌人抓走的革命者前进。她望着四周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的人们，继续大声地说：“我们年轻的骨肉为了全体人民而奋起，为了全世界的工人而前进！大家可不能离开他们，舍弃他们。相信孩子们的信仰吧——他们发现了真理，愿为真理而牺牲。”最后她还补充说：“要是人们都不愿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人们被她的话吸引住了，被打动了。有人喊道：“她讲的全是真理！”母亲凭着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用带着宗教词句的语言，向人们宣传革命真理，号召人们起来斗争。这表明了她的觉醒，她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她在呼唤革命的到来。

五一游行的失败结束了《母亲》的第一章。这样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从五一游行的失败中革命者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取决于整个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醒。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向群众作宣传，使之觉醒的重要性。

《母亲》的第二部就着重描写了包括母亲在内的革命者在工人农民中播种革命火种和工人农民觉醒的过程。

巴威尔他们被捕后，以职员的身份活动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就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自己的家中。

一天夜里，母亲和尼古拉以及他的姐姐索菲亚——一位被流放的革命者的遗孀，闲坐休息。索菲亚弹钢琴，音乐好像在表现一群受惊后飞腾起来的小鸟，把母亲引入了对过去屈辱的往事的回忆之中。母亲被音乐深深地打动了，她在音乐中对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向他们讲起了自己过去低下卑微的处境，丈夫粗暴凶残，她自己则忍气吞声，度日如年。姐弟俩很理解母亲的生活的深刻含义。别人把她当牛马看待，而在旧时代自己也默默地把自己看作牛马；她过去的的生活平凡而单调，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同样平凡单调，所以她的经历就具有象征性。而今天她的觉醒自然昭示着千百万人的觉醒。

母亲开始了革命活动，她和索菲亚扮成朝圣的妇人到乡下去给雷宾那里的农民送小册子和专为农民印的报纸。索菲亚很早就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在丈夫为革命献身后，她仍以高昂的斗志为革命东奔西走。她和母亲来到雷宾所在的木焦油工场。雷宾和农民们向母亲问起巴威尔的情况，他们知道巴威尔明知有危险，仍然挺身而出的英勇行为之后，对他和母亲都十分敬佩。

夜里索菲亚向农民讲起德国的农民起义、爱尔兰人民的苦难和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业绩。从这些话中，农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在乡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母亲和索菲亚大清早就离开木焦油工场。

从此，送禁书、传单和报纸成了母亲的工作。她每月总有好几次打扮成不同身份的女人，背着口袋，提着箱子，或水舟陆车，或徒步往返，跋山涉水，在全省各地奔波。

她渐渐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她看到教堂里装满了毫无用处的金银，而在教堂的门外，乞丐高声乞讨，瑟瑟发抖，却无人问津。当人们跑去向耶稣求救，而耶稣却被禁锢在金器堆里。她不禁想起了巴威尔对上帝的轻视和雷宾的怀疑。她祷告的次数减少了，却越来越多地想到耶稣。她觉得革命者在为耶稣抛洒热血，而耶稣仿佛在这热血的洗礼中复活了。

一个母亲熟悉的革命者由于流放和惨遭迫害，身染重病，过早夭亡，同志们为他举行葬礼。母亲和尼古拉、索菲亚都去参加葬礼。当局对这几个手无寸铁的人怕得要命，派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前来干涉。在坟场上警察和群众发生了冲突。警察用枪托、刀柄殴打、驱赶群众。母亲机智地救出了一个被打破了头的青年工人。母亲想到警察也会这样对待巴威尔，而且巴威尔可能牺牲，不免忧伤；一想到儿子的英勇，她又自豪起来。在母亲照料这个青年工人养伤的时候，他告诉母亲，他听说有一位很了不起的符拉索娃老妈妈，她在五一游行之后就入党了。听到别人夸奖自己，母亲心里很高兴，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一次母亲带了一箱子报纸，准备给雷宾送去。走进村子的时候，母亲大吃一惊：雷宾被捕了。他被押送着走在村里的路上，他双手被绑了起来，押送的警察不时地打他，但他毫不畏惧，大声地向跟在两旁的农民宣传真理。在发现母亲的时候，他大声说：世界上不只我一个人，真理是逮不尽、捉不完的。他让农民相信那些印刷品，因为上面写着真理，这些真理比面包还重要。雷宾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了农民们：人民获得解放的一天一定要到来。雷宾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的宣传说明他已经摆脱了理论上的幼稚状态，接受了革命的真理。

母亲对雷宾满怀敬佩之情。这天夜里她只好到一个农家借宿。这家的主人斯吉潘是个觉悟农民，他从雷宾的暗示中知道了这位借宿的妇女是革命者，他让另一个进步青年木工把母亲放报纸的箱子藏了起来。母亲看出了他们的面目后，把自己下乡的真实目的告诉了他们，而他们则愿意把报纸接受下来，散发出去。母亲向他们讲了革命者的英勇斗争和神圣而秘密的革命工作。母亲说，所有受压迫的人应该跟革命者走，这些人会大公无私地给人民指明一条通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两个进步农民和斯吉潘的妻子都凝神谛听母亲的话，他们深受鼓舞，表示要一心一意地开展革命工作，决不能向后退。母亲很高兴，现在她亲自向人们宣传真理了。在回城的路上，母亲觉得生活像丘陵起伏的、没有开垦的田地，它焦急地等待着开拓者，它好像在说：请在我这里播下理智和真理的种子吧——我会百倍偿还你们的。而农民的觉醒，正是对母亲这样开拓者的报答。

母亲回到尼古拉家里，看到屋子里乱七八糟，原来警察昨天夜里来搜查了。尼古拉也被地方自治局解雇了，这倒使他很高兴：从前在地方自治局老是抄写无聊的东西，过着畸形的生活，现在可以自由地生活了，能够同工人朝夕相处，一块学习工作了。母亲讲起雷宾被捕后英勇不屈的事迹，尼古拉

很感兴趣，马上写成了文章，叫人送去印刷、散发。他和母亲谈起开展工作需要很多同志。母亲自然想到了巴威尔和“霍霍尔”：他们要是越狱出来就好了。外面的同志曾考虑营救狱中的同志，可是巴威尔和难友都不愿逃走，他们愿意接受审判，表现出正大光明的气概。他们打算判刑之后，从流放地逃走。

这一天母亲去探监，巴威尔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纸条上说，狱中的同志都不愿逃走，大家希望他向母亲多加解释，还让外面的同志帮助关在同一个监狱里的雷宾越狱。母亲听着尼古拉念给她听，她说，不用解释，我全明白。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很理解儿子的行动。尽管这样，母亲在和其他同志一起接应越狱的雷宾的时候，还是暗中希望同儿子重逢。可是雷宾逃了出来，而巴威尔和其他同志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来。

审判五一游行的被捕者的日子到了。母亲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法庭，她担心一开庭法官们会侮辱、嘲弄巴威尔，而自尊心很强的巴威尔会狠狠地回敬他们、嘲笑他们，结果判决会让她同巴威尔一辈子也见不到面。其实母亲不知道，判决书早写好了，审判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一天阴霾密布，雪花飞扬。在挂着沙皇的巨大肖像的大厅里，光线昏暗，穿着钉有黄钮扣制服的职员们东奔西跑地忙碌着。一个干瘦的、没有脖子的老头子走进法庭。此人是法庭庭长，身后跟着一些身着绣金制服的人。大厅里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巴威尔、霍霍尔和另外十名被捕者跟着一个扛着出鞘的军刀的士兵走了上来。他们面带笑容，跟熟人频频点头。他们的微笑和生气勃勃的面孔，给紧张拘束的沉闷场面带来了活跃气氛，使法庭变得稍微亮堂和舒畅一些。那些人制服上的金光黯然失色了，他们也不那么神气了。大厅里洋溢着振奋人心的自信，激荡着生机盎然的活力，这使母亲感到激动、受到了鼓舞。

“审判”开始了。庭长问霍霍尔是否认罪，霍霍尔正气凛然地回答：“我有什么罪可以承认的？我既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盗，我只是不赞成这种使人不得不互相掠夺和残杀的社会制度。”巴威尔则宣布：“这里没有罪犯，没有法官，这里只有俘虏和胜利者”。另一个“被告”则拒绝辩护和回答问题，他拒绝服从这种非法的审判，是因为人民并没有授权给这班人。是的，这个法庭的组成非常荒唐，担任陪审员的有市长、贵族首席代表和杀人夺妻、盗窃成性的乡长，难怪有人说，这是打人的人审判挨打的人。

在检查官起诉的时候，母亲感到很失望：当初她曾指望能有一场公正的审判，而今一看不过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场闹剧。

后来巴威尔开始为自己辩护了，确切地说，他不是在进行辩护，而是把法庭当成讲演厅，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表现出了对这班形同虚设的法官的蔑视。他慷慨陈词，宣布了社会主义者推翻旧世界的崇高目的，揭露了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败北。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在思想领域内你们不能制造出任何新东西，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破产。我们的思想却茁壮成长，日益光辉灿烂，深入人心。你们使人们无法生活，毁灭他们，社会主义却要把遭到你们摧残的世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这一点一定要实现！”

巴威尔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法庭上同敌人斗争着。他的行动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通工人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的觉醒和

成长。

法庭按照正义和历史的逻辑一切都被颠倒了，被告成了法官，法官和陪审员则成了被告，他们丑态百出。他们贪婪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巴威尔，母亲觉得，他们是在嫉妒朝气蓬勃的巴威尔，想用目光玷污他灵巧结实的身躯。

巴威尔讲完后，霍霍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其他站在被告席上的同志也兴奋地向他探过身去。他微笑着，被同志们的激情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朝母亲坐的地方望了望，向她点点头，好像在问：“这样行吗？”母亲高兴地点点头，对儿子如此大胆地发表演说深感满意。巴威尔的话在她心中化作了坚定的信念，她坚信真理在儿子一边，斗争必定胜利。

最后，庭长按照早就在彼得堡写好的判决书宣布：所有五一节游行的被捕者都判处流放。

母亲忍着悲痛走出了法院。尽管此时已是万家灯火，但在凛冽的寒风中，法院旁边却聚集着一群一群的人，他们关切地等待着审判结果。母亲被人们围住了，大家急切地询问判决结果、谁发表了演说、内容如何等等。当人们知道这位妇女就是巴威尔的母亲的时候，有人握住了她的手，有人说：“您的儿子是我们大家勇敢的榜样”。后来，“俄罗斯工人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挤在母亲周围。警察的警笛声被人们的喊声吞没了。母亲觉得这一切像一个美好的梦。然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已经觉醒了。

莎馨卡把母亲送回尼古拉家里。她向母亲表示：一旦自己被捕，判处流放后，一定要求到巴威尔那里去，同他一起工作、生活。母亲告诉她，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就去替他们照顾孩子。但母亲说，现在她还不能离开，她有许多工作要做。母亲还说：“现在我是什么也不害怕了”。残酷的斗争使母亲锻炼得越来越坚强了。

说话间尼古拉回来了，他把巴威尔的演说稿整理了出来。他发现暗探在盯梢，他就布置母亲转移。第二天他果然被捕了。

母亲来到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女革命者柳德米拉的小房间。柳德米拉离开了当副检察长的丈夫来参加革命工作，她已经有八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母亲觉得她有些孤僻和冷漠。母亲决心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温暖她那颗冷峻的心，使之燃起烈火。母亲紧紧握住柳德米拉的手说：“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生活中已经有了普照人类的光明，并相信一定能迎来这光明，该有多么幸福啊！你们都是同志，都是亲人，都是一个母亲——真理的儿子。当我暗自喊出‘同志’这两个字时，我的心就能听到他们前进的脚步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了：柳德米拉脸上出现了红晕，晶莹的泪珠滚滚流下。

母亲拒绝了同志们的劝阻，动身乘火车到工厂去散发印着巴威尔演说稿的传单。她来到三等候车室，这里聚集着避寒的铁路工人、马车夫和流浪汉，还有候车的农民、商人和士兵等各种各样的人。

在候车室里母亲得到了装着传单的箱子之后，突然发现有个认识她的暗探盯上了自己，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捕。刹那间她产生了扔下箱子或带着箱子逃走的念头。但这些闪念转瞬之间就使她感到痛苦和羞耻，使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这时她心里产生了一股使她全身受到震撼的力量，这力量扑灭了瞬间闪出的念头，她威严地对自己说：“别给儿子丢脸！他们谁都不怕”。

在暗探和路警向她走过来同她纠缠的时候，母亲把传单向空中一撒，扔进了人群。她看到人们争抢传单，然后揣到怀里，这使她振作起来。她放开嗓门讲了起来，她告诉人们，宣传真理的人被判了刑，但真理是谁也驳不倒的；她要人们认识到生活的苦难，团结一致，奋起斗争。她看到她的话打动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眼里燃烧着她所熟悉的勇敢、猛烈的火焰，这使她感到欣慰。

暗探不让母亲说话，打了母亲一记耳光，母亲的嘴里流出了血。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喊声，他们要揍这个暗探。母亲高声叫道：“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母亲被抓走了，人群中有人为她号陶大哭。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专制强权和暴力了，再也不能忍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痛苦生活了。

母亲从一个忍气吞声，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正像尼古拉和索菲亚所感觉到的那样，母亲的命运有象征意义，她的彻底觉醒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高尔基所以把这部作品称为“母亲”，不仅因为书中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主人公，同时还有着更深刻的寓义：群众是革命之母，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能最后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觉醒和支持。

长篇小说《母亲》是以一九〇二年索尔莫夫五一游行为素材写成的。但是小说并不是这一段史实的记录。小说写成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它实际上是对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艺术总结。一九〇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高尔基受党的委托，到国外去寻求支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和十二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高尔基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对俄国革命过去和未来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思考。高尔基怀着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愤怒，反复思考着这样的问题：革命过去了，但尚未成功，“现在怎么办？”

《母亲》以艺术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日益觉醒，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俄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结合是小说反映的基本主题。由于《母亲》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了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启示，列宁给了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必读的书，很多工人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母亲》是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光辉的典范作品。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状态，高尔基在《母亲》中塑造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形象来激励无产阶级振奋斗志，以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母亲》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的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经济派”之间的斗争。前者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后者则主张工人阶级只搞经济斗争，它否定党的领导，崇尚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母亲》艺术地再现了马列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以艺术形象表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现实中的胜利。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母亲》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高尔基在一九〇七年指出：“新文学如果要成为真正的新文学的话”，就必须实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既是高尔

基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又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这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既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预见未来，从而推动现实前进。《母亲》既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真实性，又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辉。高尔基真实地描写了旧社会对人们的毒害，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工人只有靠酗酒和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母亲曾经有过的胆小和虔信上帝也是旧社会打在她身上的烙印。同时高尔基也真实地描绘了革命者艰苦的斗争和暂时的失败。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照亮了这些现实主义的描写，这样就写出了现实发展的历史趋向。高尔基洞察历史的趋向，力图在新事物中挖掘典型。像巴威尔和母亲这样的人物在当时还为数不多，但是高尔基相信，正是他们代表着历史的未来。觉悟的革命者一定会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因此他着力塑造了这样的典型。历史证明，高尔基的预见是正确的，《母亲》所表现的理想成了现实。高尔基就是这样在《母亲》中成功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成功地结合了起来。由此也构成了《母亲》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区别。

《母亲》在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年一群工人布尔什维克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我们怀着真正的欢欣鼓舞的情感来迎接《母亲》的出版，……您是愉快的，光辉的生活的歌手。您以那样伟大的气魄写了这部作品”。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母亲》在国外传播的情形时写道：“工人的报纸，主要是德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都赞口不绝……并且把它用报纸副刊或专栏的形式成万份地散发出去”。《母亲》在中国的读者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了中译本，其译者夏衍指出：《母亲》在中国受到的欢迎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反动政府立即把它列为禁书，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为读《母亲》而遭受迫害。《母亲》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母亲》都将鞭策和鼓舞着亿万人民。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共四部分，是高尔基晚期创作中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它写的是工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在这部作品里，伟大的作家高尔基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以其天才的艺术描绘，通过这一家三代人兴衰的历史，真实地、生动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发生、发展和衰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月革命前半多个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独特的历史画卷。

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农奴制废除后大约过了两年，在一八六三年，在基督变容节那天，尼古拉教堂的教徒们正在做弥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外乡人”。这个人走进稠密的人群，毫不客气地推开身边的人，把一支大蜡烛插到了德略莫夫（俄文昏昏欲睡之意——笔者注）城中最受尊敬的神像面前。

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长一把花白的卷毛的大胡子，生一头鬃曲的、密密层层的淡黑色头发，两只灰色而发蓝的眼睛在竖立起来的浓眉下面泼辣地向外张望。

这个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德略莫夫城居民们的不满和种种猜测。有人说他是牲口贩子，有人说他是田庄的总管，也有人说可能是哪个老爷的家奴。在这种种猜测中，隐约地使人感到有某种令人惊慌的心情。

这个宽肩膀、大鼻子的男子走起路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胳膊肘紧贴着身子。他走在街道上，就好像走在自己的领地上一样，稳重而且有自信。他走过去以后，人们这样议论着：“瞧他走路的那个样子，倒仿佛所有的钟楼都在为他一个人敲钟似的！”

午饭过后，人们发现这个人出现在河对岸拉特斯基公爵那片叫“牛舌头”的地角上。他在那里走着，丈量着，有时还抬起手来遮住阳光，向城里这个方向眺望。

这个人名叫伊里亚，姓阿尔达莫诺夫。他原是拉特斯基公爵家里的农奴。他作乔治公爵田庄的总管，到农奴解放的时候，脱离了公爵，得到了一笔酬劳金，决定在这里开一个麻布厂，创办自己的事业。他就是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事业”的创始人。

过了三个礼拜，那些城里人的惊恐心情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阿尔达莫诺夫领着他的三个孩子，又突然出现在县长巴依玛科夫的家里，而且不管干什么都不容分说，讲话就像斧子砍下来一样：

“叶甫塞·米特里奇，这儿有几个新人要到你的贤明的治理下来生活。请费心帮我忙在你的治理下安居下来过上好生活。”他介绍了他的三个儿子：年纪大一点的叫彼得，驼背的叫尼基达，第三个叫阿历克塞。第三个外甥，是过房给他的儿子。他们还没有谈上几句话，县长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说：“叶甫塞·米特里奇，我顺便要向你求亲，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大儿子吧。”县长简直吓了一跳。他没有料到，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第一次见面就不容分说地提出了这种要求。可是这位说话细声细气，一生处世谨慎的宗法式社会的代表人物，又没有力量拒绝，他仿佛觉得有一只熊扑到他身上来了，他对妻子说：“我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个人是要来接替我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过了五天，他就病倒了，又过了十几天就死去了。

在巴依玛科夫县长有病期间，他的女儿娜达里雅与彼得的婚事定下来了。巴依玛科夫死后，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就搬到他的家里来住。阿尔达莫诺

夫不仅给儿子成了亲，而且他自己不顾什么风俗和舆论，很快地就和长得丰满、还有几分风韵的亲家母乌里扬娜·巴依玛科娃同居了。他们俩人开始生活在一起，感情甜蜜而热烈。她不仅是他的情侣，而且是他“事业”上的一个帮手。

从这以后，这一家的“事业”就经营起来了。老阿尔达莫诺夫和他的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在大家面前晃来晃去，忙得像旋风一样。他们很快地走过街道，路过教堂门口时也只是匆匆地在胸前划个十字。在河对岸拉特斯基公爵那片叫“牛舌头”的土地上，木工啦，砖瓦工啦，像白嘴鸭那样聚在一起，造起来一座长方形的砖厂房。在厂房旁边，又用木料盖起一座好像监狱似的两层楼的大厦。每到傍晚，从河对岸传来锋利斧刃劈碎木头的清脆声、锯子和刨子的沙沙喧闹声。这一家的“事业”迅速地在这里扎下了根，像魔鬼似地成长了起来。

到了春天的傍晚，驼背尼基达给父亲和弟兄们念《圣徒传》，可是父亲却常常打断他，用自己的思想开导他们。他说，现在连沙皇陛下和老爷们都看到，强制劳动已经无利可图，现在，对自由劳动的信心已经寄托在我们身上了。他对儿子们说，“贵族已经注定完蛋了，现在你们自己就是贵族了”，他对自己阶级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说：“我们的事业应当跟兵士一样步步前进。你们，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子，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足够做三百年的。俄国工业的伟大成就应当由我们阿尔达莫诺夫家做出来！”

老阿尔达莫诺夫精力充沛，能够冲破一切阻力，推进“事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开麻布厂，需在要麻，可是人们说，这里的农民不大种亚麻，这时他就说“那要叫他们多种”。他的情妇告诉他说这里的老百姓不喜欢他们，可是他说：“哼，他们早晚会怕我。”而且在这种时候，他就举起胳膊，捏紧拳头，恶狠狠地说：“我自会把这些人打垮，谁也别想在我的身边闹腾多久。就是没有人喜欢我，我也照样活得下去。”

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是这一家“事业”的创始人，是俄国第一代资本家，是俄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他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所向无敌的创业精神和做为一个掠夺者的血腥本质。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早，天气暖，野樱树和紫丁香已经开了。一切都喜气洋洋，欢天喜地，就连人们的心都好像开了花一样。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如同这明朗的春天一样精神焕发，光辉夺目。就在他精力旺盛，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这个时候，一桩极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运搬为第二个厂房购买的蒸气锅炉的时候，伊里亚由于用力过猛血管破裂而突然死去。他的死使这个家的“事业”受到了挫折。

这部作品分四个部分。以上介绍的写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的这些是第一部分。第二、三、四三个部分写的是这一家的第二代及第三代。这里作者又把这一家的后代分为两支：阿历克塞和他的儿子米隆以及彼得和他的小儿子亚科甫。

阿历克塞和他的儿子米隆也像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一样，是资产阶级里面那些积极的、精明能干的人物。

一双鹰眼睛，一把利落的小胡子和十个钩得很紧的手指头使阿历克塞显出了狐狸那样的狡猾和机警。他以一种轻松和鲁莽的态度来从事自己的“事业”。他常常说，事业不喜欢沉闷，事业应当笑着乐着办起来。他干什么都

急急忙忙，仿佛后面有鞭子抽着他一样。他把办事业当作赌博，燃烧着永不知足的贪欲。

阿历克塞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典型，是他们的理论家。他也曾经夸口说：“我们这班人是国家的主要力量，所有的官都应该由我们商人当中的人来做”，他还竭力要把他的儿子米隆选进国会，推到掌握国家政权的岗位上去。

阿历克塞匆匆忙忙地干了一辈子，而且匆匆忙忙地死去了。仿佛碰在什么东西上撞伤了似的，一夜之间就突然下世了。

米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人物。他长得精瘦，有一个大鼻子，带一副金边眼镜，穿一双发亮的黄色皮鞋。他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目空一切，态度特别傲慢、放肆。他主张全盘欧化，主张君主立宪，他说沙皇给一帮骗子包围了，应当有些正直的人去替换他们才成。二月革命使这个资产阶级分子过早地高兴起来，他说：“俄罗斯的大病要好了，面目就要一新了。”但是他的预言是注定无法实现了。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描写阿历克塞——米隆这一支人用的篇幅并不多。他描写最多的是彼得——亚科甫这一支，他把这一支提到了首位，其中又特别突出了彼得，把他写成了作品的中心人物。他从小说最初几页开始出现，一直继续到作品的结束。作者在小说的第二、第三两部分里，又比较集中地描写了他。作品的第四部分是写亚科甫的。

老伊里亚死后，彼得就被推到工厂主的位置上，成了这一家“事业”的主要代表。他为他家“事业”的发展操了心，出了力。这一家的一切罪孽也都有他的份。但是作为这样大的一个工厂主，作为一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身上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贯穿在他思想当中的那种矛盾。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是一个宗法式思想比较浓厚的资本家。他头脑里既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有落后的宗法式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他思想中的矛盾。

阿尔达莫诺夫一家来到德略莫甫，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不久，彼得就产生了烦躁的心情。在那些嘈杂、喧嚣的新婚的日子里，他感到气闷，他说：“在乡下生活要简单得多，也安静得多。”他也曾经幻想，要“跟娜达里雅两个人到一个小小的田庄上去生活”。有一次他对尼基达说：“工厂这东西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事业。我们最好住到草原上去，在那儿买块地务农。……那样有意思得多。”

彼得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思想呢？这些思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彼得对简单的、朴素的乡村生活的怀恋，是宗法式农民生活理想的一种反映。在思想矛盾的斗争中，彼得竭力逃避嘈杂和烦躁，努力追求平静和安适。这正是资本主义来临时，一个宗法式的农民必然要产生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

彼得生活的时代是十九世纪下半期，这正是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是旧世界“翻了一个身”而新秩序刚刚开始安排的时期。这新秩序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这却是广大人民群众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他们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

彼得对待“事业”的态度，说明他像当时俄国广大宗法式的人民群众一样，对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不熟悉，不了解，对它怀有一种恐惧心理。

彼得有一回在本县的一个偏僻的密林地带旅行，在路上遇上了一场六月的暴风雨。猛烈的冰雹把树林敲打得乒乒乓乓乱响。雹子过后，大雨倾盆而下。

他到女地主波波娃家中避雨，他很羡慕这幽静的环境。他想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是可以无忧无虑地活上一辈子，一点坏事也不做的。

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许多地主正在破产。薇拉·波波娃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当时正要变卖自己的庄园搬到城里去住。但是在彼得看来，在这个家庭里，有着“一种亲切和纯正的气息”，一切都显得“惊人的舒适、恬静”。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经感慨地说道：“在那儿，我的灵魂头一回平静得睡熟了。”

这场六月的暴风雨是一场自然风暴，也是一场社会风暴，是资本主义急风暴雨的象征。作者通过对这场震撼人们灵魂的暴风骤雨的描绘，揭示了具有宗法式灵魂的彼得，对突然向他袭来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惊恐心理。

薇拉·波波娃家那种舒适而朦胧的光影，反映了彼得对过去时代那种安静生活的向往，是他那宗法式灵魂最明显的暴露。

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这一切都是与严重地妨碍经济发展的封建农奴制残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和严重的农奴制残余的相互交错，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彼得思想的矛盾，就是宗法式的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

彼得·阿尔达莫诺夫是一个比较落后、比较保守的资本家。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渐渐地被阿历克塞、米隆这样的积极分子从“事业”中排挤了出来。

彼得的形象，是旧时代的幽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反映。因此，作者叫彼得一直活到作品的最后，而且关于他死的描写，也很有象征性。他既没像伊里亚那样暴死，也没像阿历克塞那样死得那么容易，他是慢慢地、悄悄地死去的。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没有把阿历克塞、米隆，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的活跃人物，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而恰恰是把彼得这样一个消极、落后、极端复杂的人物，提到了首位，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他，这是因为，农奴制废除以后，在俄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俄国资本主义就是伴随着严重的农奴制的残余发展过来的。高尔基通过这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特点，写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写出了它不同于英国、法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那种历史风貌。

在这部作品里，每一对男女，不论是夫妻，还是情侣，在思想上性格上都很相似，很协调，都能够相互补充和说明。

身体强壮、魁梧，工作泼辣、大胆的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爱上了长得丰满、美丽，为人聪明、果敢的乌里扬娜·巴依玛科娃。他们工作上泼辣，感情上也强烈。爱情给他们带来了幸福，也给事业带来了好处。

彼得在事业中萎靡不振，在感情上也平庸乏味。娜达里雅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

娜达里雅对近代资本主义的一切技术文明，都怀着一种愚蠢的恐惧。

譬如，她害怕煤油灯，因为她相信煤油是用自杀的人的脂肪熬出来的，她还怕电灯，电灯一亮她就吓了一跳。她怕看杂技，说这个可怕的玩艺儿，对她肚里的胎儿没有好处。她怕听唱机，说那里面一定有个什么灵魂在叫喊。她还说什么学校是个“坏东西”，人有了学问就要变野等等。

当年没落的封建主义把一切近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都视为洪水猛兽。娜达里雅的这些看法，就是这种思想认识的一种表现。

如果说人们从乌里扬娜身上，看到了伊里亚思想、性格的某些特点，那么娜达里雅这种黑暗的灵魂和这些荒谬的认识，则更加具体、更加清楚地突出了彼得某些思想的落后性。

彼得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伊里亚，小儿子叫亚科甫。彼得和他的小儿子亚科甫两人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亚科甫是个最堕落最腐朽的典型。

当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他同他的情妇一起从家里逃走，在路上被人痛打一顿，从奔驰的火车上给扔了出去。摔下去以后，挨过了两天两夜就去世了，被埋在一个小车站附近的乡村墓地里。

彼得的大儿子伊里亚是个特殊人物。他身量高，长得也结实，他似乎继承了他祖父的那种来自劳动人民的品质。小伊里亚爱和下层的人在一块儿。他受过教育，接受了革命思想，和他的家庭决裂了。

这部长篇小说的冲突，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的。虽然关于工人阶级的描写用的笔墨很少，那只是一个背景，但是仍能感到这种力量的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推动，资产阶级的“事业”才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稳固，以至最后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最后的、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丰收的时期。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写于这个时期，是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高尔基就从事这部小说的创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逝世为止，用了将十二年的时间。小说长达四卷，作家逝世时，第四卷的结尾部分尚未最后完成。不过小说的情节、结构已经清楚，基本上已经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了。这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巨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家一生创作活动的总结，就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来讲，也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克里姆·萨姆金，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市侩，一个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那么高尔基为什么用自己这部总结性的、最重要的作品来写这样一个人物，对这一类的典型为什么如此重视？这要从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谈起。

在三十年代初，高尔基在同一些作家谈话时，讲到过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他说：“早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的第一次革命以后，我就想写这部书。当时自称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多少少确实也参加过第一次革命的组织工作），在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迅速地开始向右转。当时出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路标文集》和其他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指出并证明，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而且一般来说和革命不同路。”

高尔基看到，有一些人在革命运动高涨时也能参加革命，但是他们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革命一受挫折，他们不是跑掉，就是转而反对革命。一九一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开始时，那些参加了革命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背叛了革命，暴露出了原来的丑恶面目。他们开始诅咒革命，批判马克思主义，追求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潮和流派。高尔基说，这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我要“描写以萨姆金为代表的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怀着种种优郁的心情，在生活中为自己寻找最独立的、在那里他在物质上和内心上会感到舒服的位置。”

其实社会上出现的后来被称为萨姆金气质或萨姆金精神的现象，早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高尔基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他在《给苏联的“机械的公民”》一文里说，远在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间的梯弗里斯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一些这样革命者。这些人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迷失了方向，在猖狂的反动势力面前吓破了胆。他们竟然开始向人们宣传非常反动的观点：说什么“为了管理民众，鞭子和刺刀还是必须的”，仿佛俄罗斯人民“除开专制，独裁的制度以外，永远不会满意任何别种形式的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现实，特别是二十年代异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景，以其具体而生动的新的历史内容充实并加深了作家对这类人物的认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两面派和反动分子：反对派、亡命徒、派别分子、投降主义者……这一切就激起了高尔基要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中得到了反映。

下面就是高尔基笔下的萨姆金：

伊万·阿基莫维奇·萨姆金喜欢标新立异，因此当他的妻子生第二个儿

子的时候，他坐在产妇床前，就开始来说服她：

“悦拉，你知道吗，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一个少见的名字？……”

“萨姆逊！萨姆逊·萨姆金，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不坏！是《圣经》上英雄的名字，至于姓，咱们家的姓是很特别的！”

但是这个孩子很孱弱，人们怕他活不长，所以后来伊万·阿基莫维奇就抱歉地改变了主意：

“悦拉，最后一分钟我决定给他起个名字叫克里姆。叫克里姆！一个老百姓常用的名字，什么干系也不用承担。你以为怎样，啊？”

“克里姆”一词俄文是“楔子”的意思，发起音来也是尖细、干巴巴的。“萨姆金”原文由“自我”一词变来，这里使人感到有一种自负，一种依靠自己、希望表现自己的味道。

克里姆出生在“那种把大家都绞死的年代”，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俄国民粹派运动被粉碎的年代。他母亲说：“他是在惊恐不安的时代生下来的，——这时候又是发生火警，又是亚珂夫被捕，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我怀着他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他出生的日期也提前了一些，我想，他那种怪脾气就是这样来的”。

当民粹派革命家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许多人蒙受了苦难。萨姆金一家在这场斗争中也未能幸免：他的一个远房舅父死在被流放的途中，他的伯父亚珂夫两次被流放，他的父亲也未逃过被捕和入狱的灾难，接着又从大学里被开除。

民粹派运动失败之后，“忍耐吧，骄傲的人！”、“只有‘勿以暴力抗恶’的道路可以通向自由”这样的反动思潮开始在社会上出现。俄国知识分子的市侩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些人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变得聪明了”，迅速地接受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大展宏图的时代”这个口号。

萨姆金一家变得还不那么快，有一些满面愁容的人还常常悄悄地来访问他们。伯父亚珂夫，远房舅母玛丽亚·罗曼诺夫娜一点没有背叛当年的信念，但是克里姆的父亲在那些来访者面前总好像有什么过错似的，感到很内疚。

克里姆的父亲常常说：“一切美好的东西——玩具、糖果、画书、诗歌——都是瞎编出来的”。外祖母在谈到饭菜的时候，也常常对女厨子说：“你别麻烦我啦，自己编几样菜吧”。因此克里姆自己也认为“总得要瞎编些事情出来才成，否则的话，成年人谁也不会注意你”。所以克里姆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好撒谎，好表现自己。

在学校里，老师们不喜欢克里姆，对他很轻视。对于已被家庭娇惯坏了的克里姆来说，这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副校长和几位教师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这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向副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投了两块石头，把窗上的玻璃和窗台上的花盆都打碎了。又过了几天，克里姆与另一个同学德罗诺夫面对面地站在过道上，这时克里姆远远地看见副校长从后面过来了，他故意挑逗“万事通，德罗诺夫，问他玻璃是谁打的。被惹得发火的德罗诺夫就把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说了出来，于是学校马上就把肇事者叫了去，给开除了。就是这次出卖性的活动改变了学校当局对克里姆的坏印象。

一年冬天，几个孩子来到城外河岸上刚刚开辟的滑冰场上。包里斯和华丽亚不慎掉进冰窟里。他们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着。梨吉雅招呼克里姆快来营救，把皮带扔给他们。

在这之前不久，克里姆由于他自己的错误曾经被包里斯揍过一顿。这时他看到包里斯的危险处境，刹那间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果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家里，能叫许多人看到包里斯这张难看的吓坏的脸，看到他那种软弱无力和倒霉的样子，可就好极了”。

他把皮带扔给了包里斯，但是他怕自己被拉下去，于是他尖叫了一声，闭上眼睛，就把手里的皮带松开了。等他睁开眼晴，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包里斯的头和手都不见了，只剩下一顶羊皮帽子还在水面上飘荡着。

后来有许多群众来救人，不知是谁提出了这样一个怀疑性的问题：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克里姆听到这句话，好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感到自己良心上的谴责顿时就减轻了，似乎自己也并未曾有过什么错误，又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了，又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了。

克里姆十七岁了，正在中学读书。逝去的岁月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使他激动的事件。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非常自然地消失了。由于“事业”的逼迫，他父亲长期离家到国外去了，祖父和哥哥也去了。他们走后家里并未感到空虚和寂寞。民粹主义的作家涅斯陀里·卡金带着他的妻子和妹妹住在厢房里。很多人都来这里，各种思想在这里汇集，其他的人也参加了这里的争论。

克里姆的伯父亚珂夫从流放地回来了，虽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仍未放弃当年的理想。他和家里人很疏远，但和厢房里的这位作家却很亲近，因为卡金也是一个受警察监视的人。他问作家小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接头的地方？他还是说，“应当把人民发动起来”。

克里姆的继父华拉甫卡是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这资本家对厢房里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很不以为然，他说那里“是一座专门表演已经过时的了的戏法的杂技场”。他说在人民相信巫神，用木犁耕地这样愚昧、落后的国家里，靠作诗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首先必须有好的犁，然后就是要有——议会。豪言壮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华拉甫卡和卡金不同，他常常用嘲笑的口吻，怒气冲冲地谈论人民。他说，“人民是些喝得酩酊大醉的、狡猾而懒惰的人”。

厢房里还常常进行更深刻的争论。作家卡金说：“美——就是真”。每逢这时家庭教师陶米林就用权威的口吻针锋相对地说：“不对，美就是虚伪，整个的美，彻头彻尾都是为了欺骗自己而捏造出来的”。

厢房里的，以及由它引起的所有这些思想、谈话和印象，都夹杂在别的思想当中印入了克里姆的脑海。

克里姆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什么深奥难懂的问题，就去找他的家庭教师，红头发的“土圣人”陶米林。他教导他们说：“在思想领域里必须能辨别什么人是在寻求真理，什么人是在藏猫猫。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必定要找到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至于第二种人却只是想藏猫猫，掩饰自己的恐惧生活，掩饰自己对生活秘密的无知，用一种便于利用的思想来掩饰自己”。

陶米林是一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土哲学家。他常常向萨姆金这些青年人灌输一些非常反动的观点：“对信仰的热望——就是热望可以得到安静”，“一个人希望真理，是因为他渴望安静”。

克里姆时常觉得，他被别人的话给淹没了，已经看不清自己本来的面目。仿佛每一个人都害怕什么东西，都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竭力对着他的耳朵喊叫一些意见，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他们意见的收听器。

克里姆来彼得堡上了大学。住在继父华拉甫卡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他的哥哥德米特里来了也住在这里。他对民粹派依然怀有好感，又开始研究工人问题了。他告诉克里姆，伯父亚珂夫在萨拉托夫又被捕了，后来就死在狱中。他的父亲在欧洲跑来跑去，正在跟法国人、西班牙人做橡木桶板的买卖。

上了大学后克里姆接触的人物更多了。其中一个悲观主义者涅哈叶娃，当她给他朗诵一些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诗句时，克里姆被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寂寞心情所征服。在这种共同的心境中他们相爱了。

这时出现在他周围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是库图佐夫。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是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克里姆对库图佐夫没有好感，他用华拉甫卡曾经说过的话来攻击库图佐夫，说人民自己从来不会闹革命，是领袖们推动他们起来闹的。

这个期间克里姆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领袖掌握群众的意志，还是群众创造了领袖，又使领袖成为自己的工具和牺牲品呢？克里姆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

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接触的人物越来越多，而且他看见人们在不断地变化着。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霍登广场发生了一场惨剧。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赏赐给市民一些微薄的礼物。人们在争夺糖果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互相践踏，死亡二千余人，数万人成为残废，历史上称为“霍登惨剧”。

对这场惨剧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革命思想的人感到很惋惜，他们认为，当时整个人群从广场上一直冲进克里姆林宫去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迫使沙皇颁布宪法，事情就成功了，而萨姆金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说：为了几块糖果“竟有千千万万人互相践踏而死，在这样国家里，幻想发生革命，真是太愚蠢了”。他认为抱着这样幻想的人就是自杀分子。

一八九六年，全俄博览会在尼日尼——诺甫戈洛德举行。在展览会期间萨姆金希望能够看到沙皇，看到这位统治着这个巨大的、富饶的俄罗斯国家的人物。他认为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是可疑的，其中掺杂着许多不安分的人。他希望尼古拉二世是个有才干的人，一个人可以反对大家，他那年轻的手臂十分强健有力，可以举起彼得大帝使用过的狼牙棒，对人们大声喊叫：“是的，你们为啥捣乱呀？”他希望沙皇对人民的统治要更加严厉，以使俄国出现新的曙光。

克里姆·萨姆金因为有病和懒惰，没有及时申请转到莫斯科大学去。后来就决定暂时休学，今年不再到学校去了。由于空虚和寂寞，克里姆来到莫斯科华拉甫卡所办的报馆参加工作。

萨姆金有些阴暗的思想，这是可耻的，是反动的，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已经展开革命活动的年代，他这些思想，又不能随便暴露，因此他也得找一个假面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装扮成激进的样子，也完成革命所给予他的某些任务，成了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他的这个特点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也暴露得很明显。

有一次，伊诺珂夫来找他，约他一起到郊外去走走，看看那个正在修建的炮兵营房。不料，他们到那里正碰上这所三层楼房倒塌。霎时间，梁木、

砖瓦、工人，从那上面一起向下飞落。情景骇人，一片惊慌。伊诺珂夫急忙跑到前面去救人，可是萨姆金却跑开了，没有向前去。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遇上一些贫苦的农民，就是他所说的那些“暴民”正在砸仓库抢粮食。他认为这也是和他无关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可怜起自己来，他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可是他被迫看见和听见的净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一切与他有什么关系。

由于一些朋友的连累，萨姆金的家里也被搜查了。被搜查以后，人们开始用尊敬和赞许的目光看待他，有人甚至都把他当成了英雄。对于人们的这种态度，他一方面感到很愉快，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好笑，他心里想：这些人都把我看成了自己人，这是他们愚钝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可能在他们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又怕有人去告发他们，自己受牵连。一个宪兵大尉在同他谈话的时候说，看过他的笔记，认为其中有些观点是很有趣的：“例如关于在文学当中必须有保守主义的意见，就是很成熟的思想”，“那段谈到一个小姑娘喊叫‘你们为啥捣乱呀？’您所做的解释，特别使我感到高兴”。

这位宪兵军官并且开导他，要用自己为国家做出有益工作的方法纠正青年时代所犯的错误。军官问他是否认识库图佐夫，于是他讲了在彼得堡跟库图佐夫曾在同一人家入伙吃饭的事。

他第二次被叫到宪兵队时，同他谈话的是一位上校。上校对他说：“由于职务上的责任，我看过令堂的几封信，看过了您的一些笔记——我坦白地承认，使我很惊讶！这是怎么搞的，拿您这样一位私下看问题又健全又严肃的人，怎么会两次落进宪兵队军官的手里来呢？”“在那些笔记里，十分清楚地表示了您对那些政治阴谋的否定态度”，最后，请他给他们当情报员，当然不是拿薪水的职务，而是“自愿的和思想上的合作”。

在萨姆金面前现在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想他不会担任宪兵队的职务的，但是如果出版一个与政治小组和党派无关的刊物，那他倒很愿意为它写稿的。

萨姆金觉得，生活对人不断地进行压迫，宪兵上校让他当特务，库图佐夫又把他往另外的方向推。他觉得如果社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敌人都不存在的话，他就会感到非常轻松和舒适了。

萨姆金认为“革命要求一个人驯顺地承认自己是历史的仆人，是历史的牺牲品，不能去幻想什么个人自由和独立创作的可能”。他是不愿意充当这样一种角色的。他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是这样考虑的：“他常常觉得将来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过着安定的生活，享受着名气和尊敬；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妻子，她是一位能干的主妇，谦虚的女人，又擅长谈论一切问题，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她一定会很好地尽一位小小沙龙主妇的天职，由许多认真研究文化问题的人组成的小组在那个小小沙龙里聚会，而克里姆·萨姆金就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情绪，建立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法则”。总之，他是那里的主人。

萨姆金的形象体现了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理想、观点和要求，反映了某些中间阶层的情绪和愿望。所以高尔基说他是一个有“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

克里姆·萨姆金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常常溜到各个小县城里去旅行。这里那种从容不迫的朴素生活吸引了他。许多地主的美丽庄园矗立在田野当中的岗丘上，农村寺院的十字架在空中闪闪发光，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俄罗斯。他认为这里的商人、小市民和神甫是不愿意生活有什么变化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使千千万万的人跟随幻想家们——革命者走，把现存的一切都打碎，是不可想象的，未必能办得到。

以前在念大学期间，萨姆金就避免参加街上的示威游行。但是有两次他曾远远地看到过警察如何驱散和逮捕游行示威的人，那时他觉得那种做法既粗暴又可恨。可是现在他看到警察围攻和驱散学生的情景，却觉得警察的做法一点也不粗暴，也不凶狠了。

斗争越来越复杂，街头上人们在辩论，示威。当萨姆金重新又只剩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熟悉的寂寞感觉和惊恐心理又笼罩了他。过去种种可怕的情景又在他的脑子里呈现出来：几十万黑压压的人群在霍登广场上骚动，把他们脚底下的地面都要压塌了，如果这股力量团结一致地向沙皇的铜像冲去……啊，这太可怕了。不过这时他突然又想起来那句口头语：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对于萨姆金来说，这句口头语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凡是对他不利或与他为敌的东西，都会被这句话所吞没，被这句话淹死，就像当时包里斯淹死在那条河里那样。

萨姆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中，他老是处在十字路口上，他哪条路都不想走，可是周围尘土飞扬的旋风却把他转过来转过去，不让他安宁。他觉得过着这样生活的人，不止他一个，而是成千上万。在这动荡的年月里，这种旋风旋转得越来越凶了，而一切没有力量反抗它，没有力量躲避它的人都给卷进中心去了，而像库图佐夫、波亚尔珂夫、葛根、乌素夫一类的人却在不住地和拼命地给这个旋风增添力量。这一类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速度在增加，而且毫不客气地和粗暴地指挥着那些由于某种误会而帮助他们的人。

想到这里萨姆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抽着一支纸烟，想起了那个驼背小姑娘的喊叫：

“真的，你们为啥捣乱呀？”

萨姆金每次谈到工人运动或学生风潮，总是强调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强调他们的破坏性。

萨姆金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政府制造的“流血的星期日”这一惨案的目睹者。当时人们还不清楚他的真正面目，因此，为了给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募捐，有人请他就这一事件作了几次报告。他本来把这些人看做仇人，可是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心里本来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沙皇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希望别人听到他的讲演会感到恐怖；因为他认为恐怖会使他们清醒。他看到他正在达到这个目的，一些人听了他的报告确实感到很恐怖。

报社也请他就这一天的事件写一篇时事文章。写出来以后，编辑部有人微笑着对他说：“这是一篇吓唬老百姓的东西”。

他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天这样成功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在他的脑子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为了消灭革命党人，所以才需要革命”。他认为，在这样历史事件之后，“那些胡言乱语的人或者是改造好，或者是毁灭掉”。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克里姆·萨姆金像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急剧地向右转了。这时萨姆金政治上的反动色彩更加浓厚了。

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只是不愿意为革命做什么牺牲，那么现在他对革命则怀着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了。

萨姆金说尼古拉一世镇压群众，“是自卫，每个人都有权保卫自己”。他说生活把人们骄惯坏了，确实应该有一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服从的暴力。

但是萨姆金有个小市民的灵魂，他总是标榜他“超阶级”、“无党派”，幻想维护个人的绝对独立，走中间道路。这样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两军对垒日益分明的时候，脚下没有坚实的基础，脑子里没有明确的信念，显得十分软弱和空虚。在公开场合，在人们面前，他故作姿态，还能勉强应付，但当他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内心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凄凉：“孤独啊！在这世界上我只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快到四十岁了，这已是人生过半……”这种人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认为俄国不需要革命，只需要改良。他说，你“看英国吧，这代议政治和社会仲裁的发源地，并未革命就强大起来，征服了半个世界”。他自己也发现，“我好像是立宪民主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了。

萨姆金本来并不关心工人运动。但是自从听说西欧某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占了大多数，有人因此当上了什么议长，做了官。这时萨姆金就认为他是生活在能够产生英雄人物的时代。这是我们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到萨姆金那种要在政界显露头角的心理。

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姗姗来迟，当克里姆·萨姆金刚刚开始想到政权的时候，俄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已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的梦幻是注定无法实现了。

高尔基原来打算把历史事件写到一九一九年同尤登尼奇的斗争为止。但是由于作者的逝世，原来的构思没有全部实现。小说现在是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回到彼得堡，工人发生了自发的示威游行，克里姆·萨姆金被游行群众踩死而结束。

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是工人运动已经广泛展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已经轰轰烈烈进行的时代的一个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萨姆金的形象表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统治欲的破产。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统治欲破产的整个历史过程。

小说发表后影响极大，因此主人公萨姆金这个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一听到萨姆金这个词，人们马上会想到市侩，想到两面派，想到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些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知识分子。所谓萨姆金气质、萨姆金精神或萨姆金主义，就是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指有些人对革命、对革命人民所怀的那种反动情绪和阴暗的心理。

当然这部作品不止是塑造了克里姆·萨姆金这样一个典型，它的内容比这要丰富得多。

这部长篇史诗有两个书名，在正标题《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之下，还有一个副标题：四十年。这两个标题就反映着作品两方面的内容。

作者所以要加一个副标题，就是强调这部作品的历史内容，让读者注意作品里所反映的俄国革命前“四十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它包括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十月革命前这个时期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如民粹派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八九六年在尼日尼·诺甫戈洛德所举行的全俄工业博览会，霍登广场惨案，一月九日“流血的星期日”，颓废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出现，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骚动，一九一五年革命，第一

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等等。

在这部史诗里，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仅是背景，它们有着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它们推动或者制约着萨姆金思想、性格的发展，主宰着他的命运。因此这部书，既是一部描写萨姆金生活道路的小说，又是一部反映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史诗。

在这部史诗中，作者对形成克里姆·萨姆金性格的社会条件——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描写。在这里作者写了三类人。

第一类是资产阶级事业的实践家，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主人”。大企业家华拉甫卡是这一类人物突出的代表。华拉甫卡是萨姆金的继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它对萨姆金社会政治观点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些为地主、资产阶级沙皇帝国编造谎言、制造舆论，忠实为它服务的“奴仆”，是萨姆金思想生活中的“导师”。萨姆金的家庭教师陶米林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

第三类是正从资产阶级社会中“跌落”出来的人物。这些人虽然不满意本阶级，甚至产生了和它敌视、对立的情绪，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还没有新的思想武装，还没有走到革命、走到人民方面来。这类人物的出现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不稳，说明革命已经临近。

这部史诗全面地反映了俄国广阔的社会生活，除了上面我们介绍过的三类资产阶级人物以外，作品还写了人民群众，反映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革命者的形象。这里最突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性格完整，立场坚定，行动果敢，正好与萨姆金形成显明的对照。在高尔基全部作品中库图佐夫是一个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最高、最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这部作品主要是揭露以萨姆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因此描写人民群众，描写革命者没用多少篇幅。但是作品仍使人感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这部作品内容广泛而深刻，构思新颖，形式独特，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一个非凡的现象。

这部作品有三个最显明的艺术特点：

第一，它的内容极其广泛而丰富。这一点连作家法捷耶夫都感到吃惊。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写道：“难道这一切都是您亲眼看见、亲耳听说过的吗！简直令人震惊。当然，这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而且，与其说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毋宁说是关于整个国家的，……。这一切，所有这一切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异常宏伟、完整而真实的图画。”

第二，这部小说对衰落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动本质，包括对它的政治、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的观点，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多少年来，人们对资产阶级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所编造的谎言，从来还没有这样逼真、这样尖锐地揭露过。高尔基不是一般地谈论某种观点的反动性，而是把它和资产阶级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利益的联系揭示出来，这就使这种揭露显得更加生动而有说服力。

第三，是它的独特的结构形式。在这部作品中，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和一切敌视革命的政治思想，一切反动的势力和思潮都有联系。它是一个焦点，社会上的一切落后的、反

动的东西都要集中在他那里；它又是一面镜子，反映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特点和情绪。

这部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而深刻，因此也比较难懂，所以也常有人埋怨作品写的太复杂，叫人摸不着头脑。

文艺观

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因此，当我们考察一位作家的文学观时，首先要谈到他对现实的看法。

三种现实

那么高尔基对“现实”这一概念是如何理解的呢？它的内涵如何，作者对它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高尔基对现实有两种划分的方法。一种是根据人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来划分的。在谈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生活时，高尔基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占统治地位的‘有权’阶级的现实”，即所谓“文明的”现实。

这种现实的主人们千方百计地对人们进行严酷的统治，除了思想上、政治上的统治之外，有时还不择手段地、大量地屠杀那些不顺从的人。但是在这种现实里，却集中了人类用许多世纪的劳动和创造积累起来的一切最美好的和有社会价值的科学、艺术成就。

“另一种是被统治、被征服和恭顺的人们的现实”，在这种现实里，人们常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仍过着贫穷而凄凉的生活。这是一种可怕现实。

在对现实的这种划分中，高尔基的爱和憎是非常鲜明的。他的批判锋芒对准着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有权”阶级的现实，那种所谓“文明的”现实；他的全部的阶级同情是在被统治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一边的。

上边这种划分法，在高尔基的文学论文中不多见。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按照现实的发展趋势来划分。按照这种方法，他把现实分为三种：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道：

“我们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也就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创造的那种现实。我们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

高尔基认为，这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很重要，看不到它就无法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无法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高尔基说，必须对它加以注意，这是时代的号召，是革命的需要。

高尔基在这里所说的第三种现实，已经不是与现实脱节的那种浪漫主义理想，而是直接从现实中发展来的，是现实的直接的延续。

上面所谈的三种现实并不是相互隔离，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高尔基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发表的《两个五年计划》一文里写道：

“应该注意三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它是一切前提所由产生的所在；现在的现实，它正在为反对过去而斗争；未来的现实，它的大概的轮廓现在已经看得见了。”

高尔基对现实的这种划分方法，说明他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地静止地来观察现实，而是用辩证法的观点，从事物的发展中来观察生活的，说明了他对现实所采取的革命的态度。

文学的真实性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高尔基对现实有科学的解释，从而对文学的真实性也就有了正确的理解。

在高尔基的理论中，正像现实有“有权”阶级的现实和劳动人民的现实一样，真实也有“有权”阶级的真实和劳动人民的真实。现实有丑恶的现实和美好的现实，真实也有丑恶的真实和美好的真实。

正像现实分为三种一样，真实也有三种：过去的真实，现在的真实和未来的真实。

高尔基认为，对待各种不同的现实，作家应该具有明确的立场，同样，对待各种不同的真实，他也应该具有鲜明的态度。

高尔基在评论作家的作品时，从来不问他写的是不是真实，他认为只问真实不真实，不仅很不够，而且也很不科学，他总是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他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真实？是那个正在衰亡的真实，人们正在从事创造的那个真实。还是属于未来的那个真实？第二，他为什么写作，他肯定的是什么样的真实？他希望什么样的真实获得胜利？

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高尔基在一封信中批评一位具有自然主义错误倾向的作家时，写道：

“作者对于过去时代的真实看得还算清楚，但是他没有清楚地了解，对这种真实他应该怎样办？作者真实地和津津有味地描绘了矿工们的糊涂、醉酒、打架以及一切在他的——作者的视野中大概占优势的东西。”高尔基紧接着说道，“当然，这是真实”，但是这“是十分龌龊的、甚至令人痛苦的真实，必须同这种真实进行斗争，一定要无情地把它消灭掉”。

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里，在批判当时形形色色的颓废派作家时，写道：

“这是一群古怪的人物。他们总是忙忙碌碌地在世上最高的钟楼脚下兜圈子，像小狗似的尖声汪汪乱叫，……有时我们从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口中获悉，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位祖先曾在某部任职，果戈里具有令人十分讨厌的性格特征，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珍闻。”高尔基在写了这样一段话以后，马上评论道：“也许这些都是真的，可是多么渺小、庸俗、无聊啊……”

从上面介绍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尔基认为，正像不是一切现实都是美好的，都应该肯定的一样，并不是一切的真实都是美好的，都应该肯定的，这得要看你所反映、所肯定的是什么样的真实。

假如你所反映和肯定的是“有权”阶级的真实，是过去的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就应该受到批判；如果你所反映和肯定的是劳动人民的真实，是未来的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就是进步的，革命的，就应该受到赞扬。高尔基就这样把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统一起来了。

高尔基在一封信里，曾经对一位作家讲过这样一段话：您“不能这样狭隘地去把握现实，就像您在这个短篇里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忠实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对于事实的心理”。这句话讲得很大胆，但也很深刻，很精辟。我们应该很好地去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切不要以为，高尔基在这里在教导人们，可以不顾事实，随意地去歪曲现实。

那么这么说的道理何在，为什么必须如此呢？高尔基在另外的地方，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艺术作品的目的是充分而鲜明地描写事实里面

所隐藏的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

高尔基的这句名言肃清了自然主义的一切影响，澄清了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混乱。

革命浪漫主义

高尔基非常重视革命浪漫主义。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学契诃夫写过一封信，就是关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人》那封著名的信。他在这里写道：

“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都希望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开朗明快的东西，您知道，希望有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一定要使当代文学多少开始美化生活，只要它一开始这样做，生活也就会美化起来，就是说，人们就会生活得更轻快、更开朗。”

一九二八年春，高尔基发表了《向工农通讯员和军队通讯员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高尔基认为，应该赞美人，因为一切美好的有社会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意志，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他说特别是现在，“人在很多方面还是野兽，而同时人——在文化上——还是一个少年，因此美化人、赞美人是非常有益的：它可以提高人的自尊心，有助于发展人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也曾经讲到浪漫主义的问题，谈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及其意义，他说道：

“虚构就是从客观现实的总体中抽出它的基本意义并用形象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从客观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测——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并以此使形象更为丰满，——那么我们就有浪漫主义了。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

高尔基认为，艺术应该比现实站得更高，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他提高到现实的上面来。也是在一九三四年，高尔基在《和青年作家谈话》一文里写道：“我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主张文学高于现实，能够稍稍居高临下地去看待现实，因为文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反映现实。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革命浪漫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

革命现实主义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是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同时开始写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谈我怎样学习写作》里回答道：

“由于‘令人苦恼的贫困生活’对我的压力，还因为我有这样多的印象，使得‘我不能不写’。前一种原因促使我企图把《鹰和蛇的故事》、《燃烧着的心的传说》、《海燕》这样一些杜撰、‘虚构’的东西带到‘贫困的’生活里去；而由于后一种原因，我就写了几篇‘现实主义’的小说——《二十六个和一个》、《奥尔洛夫夫妇》、《鲁莽汉》等。”

高尔基在理论上也是这样，他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同时并重的，他既非常重视浪漫主义，又很重视现实主义。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也就是在他写关于《带小狗的女人》那封著名的信的同一个月份里，高尔基还发表了《从契诃夫的新作短篇小说〈在峡谷里〉说起》这样一篇重要论文。

假如说关于《带小狗的女人》的那封信所强调的是浪漫主义，那么《从契诃夫的新作短篇小说〈在峡谷里〉说起》所肯定的则是现实主义。在这篇论文里，高尔基通过契诃夫这篇新作，论述了这位作家的创作特点，并给了它以很高的评价，他写道：

“所有这些人，好的和坏的，活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正像他们活在现实里一样。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里，丝毫也不会有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他的才能的巨大力量正是在于他从来不凭空虚构什么，不描写‘世上所无’的，但也许是满不错的、也许是合乎愿望的东西。”

高尔基的这些观点和写给契诃夫的关于《带小狗的女人》的那封信中的观点是否矛盾？高尔基在这里是否用现实主义否定浪漫主义？不，这里并不矛盾，他并不是用现实主义来否定浪漫主义。

高尔基在这里所谈的是契诃夫的创作特点，他的巨大力量的所在，而且并不是一般地在评价浪漫主义这种方法是好还是坏。他在这里只是指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成就不是靠浪漫主义，而是靠现实主义的方法取得的，他在这里所谈论和强调的是现实主义。高尔基在这里告诉人们，不仅只有浪漫主义能够给人以理想和鼓舞，能够积极地影响现实，现实主义也同样起到这种作用。

在开始阶段，不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高尔基还都没能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这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到了本世纪初，由于俄国解放运动的广泛发展，由于作家本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逐渐形成，他就写出了像长篇小说《母亲》这样新型的作品，在这里他把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后来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

高尔基虽然一直都非常重视浪漫主义，但是随着创作水平的提高，他逐渐地明确起来，两相比较，还是现实主义更为有力量。在一九〇一年，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作一个浪漫主义者，这是适时的和可尊敬的；但是始终作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必需的，因为只有它才是令人信服的，只有它才可以有力地触及心灵，只有它才是不朽的。”他后来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

文学的目的性

高尔基认为，文艺从来就是有目的性的，就不是纯客观的，从它自发地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如此，通过文艺发展的历史，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的艺术权威。他对文学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讲述得更加透彻和清楚。

高尔基说，文学家是阶级的器官，是阶级的耳目与喉舌。“他感受、体现并描写本阶级、本集团的心情、愿望、不安、希望、热情、利益、缺点和优点”。他自己也受着这一切的限制。文学是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文学家作为一定环境和时代的人，不管他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他都必须为自己的时代和环境服务。

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道：艺术的任务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艺术精神就是力求用词句、色彩、声音把您的心灵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把人们身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高尚的、自豪的、优美的东西，都体现出来。艺术描绘庸俗的东西和粗野的东西，为的是嘲笑这些东西，消灭这些东西”。他在《论艺术》一文里说，人们爱听悦耳而有旋律的声音，爱看鲜明的色彩，爱把自己的环境改变得比原来的更好、更美。他说，“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来消灭那庸俗贪婪的小市民习气所造成的生活中可耻的卑鄙、齷齪。艺术的目的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

那么文学的目的性是否会妨碍它的真实性呢？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总好强调文学的客观性，似乎一谈文学的目的性，文学就不那么客观，不那么真实了。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它们本身就带有目的性。高尔基在谈到工人生活的特点时，写道：

“工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拿着一块无定形的材料，用铁矿制造针和炮，以及介乎这枚针和炮之间的一切东西，他制造初轧机、巨型的机器，……工人的志向是要支配一切自然力，尽可能从自然界取得更多的东西。”

高尔基对工人阶级生活的观察和看法是正确的。在这里他谈的是工人阶级，其实，在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朝着不同的方向在改变着世界，中立的、无目的性的活动是没有的。文学也是一样，所以高尔基说：“艺术的目的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

